



总第70期 2018年12月出版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2006-L001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010）83976501
（010）83976494
E-mail：Xczy8806@126.com

编委会

主编：李茂福
副主编：李勇 金梅 汪杰
编辑：张小丽 符欣 江成
孟霞 庞晨
摄影：陈淑运
题字：爱新觉罗·溥任
封面：地安门（民国初年）
封底：远眺地安门外大街

敬告各界读者

●本刊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作者来稿必须是著作权人或依法享有发表权的公民，如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并对由此给本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刊已纳入《北京西城往事》、北京西城档案信息网。凡《西城追忆》发表的文章在以上书籍、网站采用，不再重复支付稿费。如对此持有异议，来稿时请事先说明。

目录 Contents

红色记忆

- 01 毛泽东访故友心系知识分子 曹国萍
- 02 承续红色血脉 不忘红色初心
——沿着代表足迹寻找我们的信仰 王玉华

专稿——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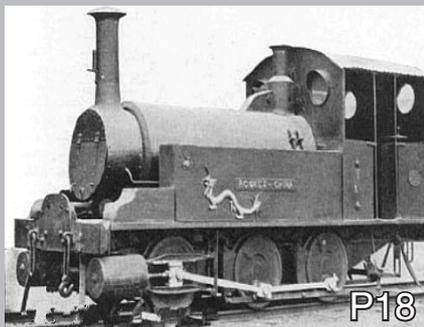
- 10 改革春风润万物
——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 张世俊
- 14 难忘北营房中街的户外水龙头 汤学良

档案记忆西城

- 16 北京最早的铁路在西城
——慈禧三海修铁路记 刘江华
- 21 冬储大白菜的记忆 原启长

西城追忆

爱新觉罗溥任



口述纪实

- 26 我所认识的三位西城人（三） 王宝升
- 27 “十年湖海 一肩风月”
——爷爷张恨水的晚年生活 张纪

西城故事

- 33 记寓居砖塔胡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 郑再帅
- 37 可亲可敬的“苗大爷”
——忆漫画大家苗地先生 徐进

老城名片

- 39 画舫斋的记忆 王震亚
- 43 北京内城现存的下马碑 史可非
- 50 西城的里弄式住宅探寻（下） 白皓



更多精彩内容请微信搜索
“西城档案”或扫描二维码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问题，编辑部予以更换

毛泽东访故友心系知识分子

□ 曹国萍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广泛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与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5月，北师大代校长、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汤臻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叙说早年同学情谊及别后情况，并向老同学表示祝贺。6月17日，毛主席与汤臻真通话，要来北平师范大学看望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那天下午3点，毛主席乘车来到了位于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的北师大教师宿舍，拜访了汤臻真，以及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学家黎锦熙和同乡、地理学家黄国璋等故友，倾听和了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的意见建议。

在汤臻真家，师生老友相聚，畅叙旧情，畅快随意，客厅里充满欢欣喜悦的气氛。汤臻真询问共产党的政策还会不会变？毛泽东解释说：共产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青年、壮年的成长过程，在共产党的幼年时期难免犯错误，但现在共产党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大家听了这一番话都感到诚挚可信，就接连提出许多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均做了回答，并强调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黄国璋向毛泽东介绍了九三学社的情况，大家也对新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欣然说到：“还是党外

有党好哇！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谈话间天色渐晚，汤臻真让家人备饭。毛主席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不麻烦你们了，今日之聚会，不只是乡情了，该轮到我为掏腰包喽！”于是吩咐随从的工作人员去准备，工作人员就近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席间，毛主席说：“我和各位都是新中国的‘长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不是地主老财或资本家，而是人民，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深入知识分子中间，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倾听知识分子的心声，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承续红色血脉 不忘红色初心

——沿着代表足迹寻找我们的信仰

□ 王玉华

小序：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西直门内南草场后广平胡同）一层大厅有一架新书，我翻阅后很长知识。西城区第二图书馆（菜市口西教子胡同）一层大厅内有关中共一大至十九大的展览，我看后很受教育，再加上听了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永定河研究会联合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打造幸福北京城”宣讲报告，很是感动。就萌生了想写篇文章的想法。如今提倡红色旅游，那么就将中共代表大会会址也顺便做一简单介绍。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召开一次，也有间隔17年、11年、13年、以及4年召开一次，自党的十二大后定为每5年召开一次至今。

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延安—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变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

党代会是党的发

展进程中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结点，历史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

党代会是党内各方面代表的大聚会，是代表们展现性情和才智的大舞台，他们在会上交流思想、碰撞火花、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历次党代会深刻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党的诞生地，中国红色基因的发祥地

中共一大会址：上海黄陂南路374号（旧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召开时间：1921年7月23日—7月30日（31日）

出席代表：13人（代表全国50名党员）

注：陈独秀，李大钊未参加



中共一大会址

最后一天的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红船”），前一天开会的地方受到巡捕房搜查后为了安全迅速转移到南湖，包了一个画舫，在湖中船里继续开会。会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起到了党章作用。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共产国际

中共二大会址：上海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召开时间：1922年7月16日—7月23日

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提出反封建纲领，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会上第一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注：会址纪念馆是一栋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也是中共早期党员李达的寓所。李达是上海代表，他主持创办过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并任校长。



中共二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党章

中共三大会址：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孤院路3号（旧址：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

召开时间：1923年6月12日—6月20日

出席代表：4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党章，第一次规定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分别决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这次大会还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为中国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为党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注：三大会址毁于1938年10月侵华日军飞机对广州的轰炸中，直到1972年才发现遗迹，1979年遗址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经广州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勘察完全确定后，动工修复于7月1日建党85周年之际，中共三大会址保护工程纪念馆落成并对外开放。



中共三大会址

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

中共四大会址：上海吴淞铁路旁边四川北路公园内

召开时间：1925年1月11日—1月22日

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大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规定党员三人可以成立支部，第一次将党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首次将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书记。

中央政治局修正党章

中共五大会址：位于“中国第一红街”——湖北省武汉武昌江边都府堤街20号

召开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名党员）

会上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和机会主义错误。

中央政治局修正章程，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规定了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把党和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

注：会议的第二天，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



中共五大会址

就义（地点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遇难后其灵柩暂存长椿寺后院，五年后安放海淀区万安公墓。中共五大会址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会址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小学）。

2007年，对“五大会址”进行了挽救性保护修缮，复原了会址内的风雨操场、小礼堂及教职工宿舍。

2011年，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毛泽东旧居”进行了修缮。

突出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

中共六大会址：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区“五一”村。

召开时间：1928年6月18日—7月11号

出席代表：142人，其中后补代表58人（代表全国？名党员）

六大会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常设展览馆。

2017年7月4日，常设展览馆落成仪式在莫斯科

科举举行，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致了贺词。

注：“五一”村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这里曾是贵族庄园。“波乌麦斯基”在俄语中是“五一”的意思。

注：关于全国党员总人数，为什么是空缺，写了一个问号呢，至今这在党史上一直是一个难题。我查了许多资料均查不到，后经跟北京市党校老师核实确认没有准确数字，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被杀、脱党、失踪甚至背叛者很多，难以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有“约4万名”的说法，但因没有有力证据，所以，新出版的官方资料书籍都没有采用。

相隔17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一开就是50天

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召开时间：1945年4月13日—6月18日

出席代表：755人，其中后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多名党员）

七大是历届党代会召开中间间隔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历届会议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50天。有的代表为了参加这次会议在延安等了好几年……。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党章，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第二次增加了党章总纲部分修改，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习仲勋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成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最年青的一位，时年31岁。习仲勋是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正式代表参加七大的。毛泽东还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全国政协礼堂原址为清顺承郡王府

在顺承郡王府里开党代会

中共八大会址：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全国政协礼堂

召开时间：1956年9月15日—9月27日

出席代表：1133人，其中后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多名党员）

应邀参加大会的还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还有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加。

十五大以前，八大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党代会，毛泽东致开幕词，首提：“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此次特点：公开、透明、民主、强调科学。首次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首次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一直延用至今。

党执政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提出开展社会主

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地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顺承郡王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府邸原位于西城区赵登禹路全国政协所在地，1984年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按1:1比例迁建到朝阳区朝阳公园南门东200米处。

勒克德浑顺治五年（1648）因有战功，晋封郡王，（他的父亲是薛哈廉，薛哈廉是代善的第三子）

顺承郡王共传子十七代，最后一代在1917年将王府出租给徐树铮。

1920年张作霖进北京时占用了此王府称——“大元帅府”；

1931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此定居；

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设机构办公之地；

1956年中共八大在此召开，召开前将王府大门拆了盖的礼堂，以后简称全国政协礼堂；

1994年将王府按1:1比例整体三进院迁移到朝阳区朝阳公园南门东200米处，保留有琉璃牌楼、府门、三进院落、中路、西路、东路、后罩楼、花园格局。

九大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纲领

中共九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首届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召开时间：1969年4月1日-4月24日 距上届相隔13年

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多万名党员）

此次代表会在经历三年动乱之后，在“准备打仗”的口号声中召开的，林彪作政治报告，大会将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这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九大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纲领，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缩影。

十大继续了九大左倾错误

中共十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73年8月14日-8月28日

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多万名党员）

十大是在筹备和召开都十分仓促和草率下召开的，开幕式上用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中共十一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77年8月12日-8月18日

出席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

由于历史条件，此大会没有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的任务。

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二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82年9月1日-9月11日

出席代表：1545人，其中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

十二大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创



从中共九大开始，历届党代会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造，顾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党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而创设的。目的是逐步实现中央委员会的年青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作用。

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各方面新的目标……。第一次把党的地位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十三大增加特邀代表，继续推进离退休制度

中共十三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

出席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赵紫阳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重要准备是：提名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这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继续推进离退休制度。

十四大的召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中共十四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92年10月12日-10月18日

出席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5000多万名党员）

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删去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从十五大起，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

十五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

中共十五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1997年9月12日-9月18日

出席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名党员）

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

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五大庄严宣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章中明确这样规定的。

十六大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六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2002年11月8日-11月14日

出席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全国6600多万名党员）

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中共十七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2007年10月15日-10月21日

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名党员）

胡锦涛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有评论说：“中共十七大不仅影响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还将影响全球的架构。”

十八大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

中共十八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2012年11月8日-11月14日

出席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8200多万名党员）

胡锦涛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提出新要求。

亮点一：农民工代表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出现在党代会上。

亮点二：党代会历史上，十八大是开放的大会，国内外记者共2700名。记者人数最多，首次超过代表人数。

亮点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亮点四：十八大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亮点五：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

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共十九大会址：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时间：2017年10月18日-10月25日

出席代表：2280人（代表450多个基层党组织和8900多万名党员），特邀代表74人，中外记者：3068名

大会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砥砺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同志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重大理论观和战略观写进党章。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让我们沿着红色足迹去寻找我们的信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参考书目：《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作者：李颖。党建出版物出版社。

改革春风润万物

——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

□ 张世俊

在历史的长河中，40年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于我国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发生深刻而广泛变化的40年！

这40年，世界对中国越来越关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从来没有这样快。人们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十分赞叹，对改革开放的描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衷、这样具体、这样生动！世人对这40年巨变感同身受，每个人都可以讲述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回顾走过的4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难的探索、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谱写了一曲中国改革开放壮丽的诗篇。小岗村的“大包干”，如一声春雷冲破人们思想桎梏，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由此从农村到城市，改革的浪潮不断升腾。深圳经济特区，从边陲渔村，到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之城！短短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历史的回眸——回忆与思考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有两层含义。

其一，从政治上讲是和平。尽管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1840年以后不断遭受外国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虽有短暂的经济展期，但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中华民族遭受生灵涂炭。1949年后我们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一直处

于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时刻要准备打仗。新的和平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曾看过一个资料，19世纪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国王马哈茂德二世非常精明，是一个锐意改革的苏丹，他经过精心准备谋划，于1826年大力推行改革。但时运不济，从1826年至1838年经历大小6次对外战争，马哈茂德二世也于1839年去世，终于一事无成。再比如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幸福指数是高的。但现在民不聊生，战乱不已，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

其二，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向战后世界平等、共存和共赢的和平发展模式转换，建立健全了多边国际制度，促进了时代主题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欢迎中国的崛起，当然这是以不超过美国为限，这就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是西方国家垂涎欲滴、梦寐以求的。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由于初始条件不同，我国发展路径也有很大不同。换言之，与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有关。国内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先是通过暴力革命，没收地主土地，而后又进行集体化运动，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国有制，这就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骨干，这就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坚持这个方针不动摇，这才使我们经济发展有了强大动力，也才有了西方国家对我改革开放的包容性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帮

助。

第二，过去40年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思想解放。80年代初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说：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邓小平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把国人从“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由于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僵化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科学思考和创新热情极大地迸发出来，从而创造了人间奇迹。

第三，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40年。改革开放的实行和进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党的理论武装了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尊重知识、尊重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念，深深融入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党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与拥护，造就了改革开放巨大动力和丰硕成果。

第四，对外开放是改革的推动力，二者相辅相成。

旧中国长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国家的统治精英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皇上连英国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多么滑稽！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也使大批青年才俊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更多的“海归”成为我们科研前沿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科学创新事业贡献了力量。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靠我们自己闯、靠我们自己的伟大实践。马克思曾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在看到4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过去采取出口导向、引进外资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其消极后果也不容忽视，引资越成功，外资投资收入越大，这是GDP的组成部分，就是说GDP中大部分收入不是中国的，而是外资的。再比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数亿农民进城、人口大量流动，对旧有的社会组织结构造成冲击，还有教育、医疗、住房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当前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的难度进一步增大，但改革开放不能停止，必须大力推进，这是我们当代人应负起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秘诀，是中国特色的特点所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新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人凝聚人心的旗帜，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西城区发展战略演变过程的认识与实践

城市发展战略是为了研究解决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一个地区发展没有战略思路，没有顶层设计，不了解不认识自身客观条件，盲目提出未来发展目标、要求，地区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会直接影响城市发展速度、方向和前景，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不平衡的、不稳定的！

就西城区来说，改革开放40年是对区情认识不断深化，对战略目标不断发展的过程。

1983年我调入原宣武区，后参加区委常委会工作。给我的印象是区委领导同志思想解放、勇于担当、有战略头脑、敢为人先。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筹建大观园。当时红楼梦剧组正在选

址，老艺术家黄宗汉主动联系，与区委几次磋商，决定在南菜园地区，利用剧组置景费，先搭建一期工程，此事取得区委一致赞同。这是原宣武区第一次利用区外资金搞建设，在全市乃至全国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二是在城市改造、城市建设中，原宣武区修建了全市第一条临水休闲大道（护城河金中都公园早期一部分），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环境，也为日后建设改造金中都公园奠定了基础。

在原宣武区工作一年多，1985年初我调到西城区工作，当时西城区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研究全局性的宏观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于是1985年3月，西城区委区政府召开了“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并形成报告，中央、市、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及区内各部门负责人270人参加，形成初步共识：首先，西城区地处首都中心，是中央首脑机关重要办公区，是展现文明古都和文化名城风貌重要地区，也是商业比较发达地区。这就决定了西城区主体功能是为中央领导全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服务；为工作、生活在西城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首都和外地来京的全国人民群众服务。其次，根据西城区特点和实际，主要任务是搞好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搞好科技、教育、文化建设，搞好经济建设。再次，以旧城为突破口，搞好城市规划建设，这是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根本途径。这个报告对区情特点、主体功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对策集中进行了提炼、概括和升华，成为西城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文件。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西城区对区情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1. “繁荣西单、发展西城”：

西城是北京商业经济活动重要地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是西城重要的支柱产业，而且当时地铁已建成，西单为一站。东、西方大量顾客会汇集至此。繁荣西单、发展西城战略是以繁荣西单为龙头，重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使各街道各行业都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全区经济的繁荣。1992年西城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北京市比重达9%，按区属口径统计，当年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占西城国内生产总值的50.6%。再看西单地区：西单路口至灵境胡同区段建成多功能的市级综合性商业中心；西四和新街口地区建成的饮食、百货中型门店为主的商业中心；其余地段，将逐步建成多具特色的商业街区，将西单地区建成首都繁华的现代化商业中心。

2. “大力发展五业，重点建设五街”：

1998年西城经济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内生产总值比1993年翻了一番，全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5%，成为西城经济的支柱产业，区域内多类金融机构70多家，经营网点270多个，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7.7%；文化旅游业发展较快，文化市场初具规模，已形成娱乐、音像、书刊、印刷等大门类，多类文化企业1225家；信息咨询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各类咨询机构600多家。在这样形势下，提出了大力发展五业，重点建设五街的战略思路。

大力发展五业，就要大力发展商业（包括传统服务业、餐饮业）等优势传统行业，提高其知识含量和现代化水平。

鼓励、扶植房地产业、文化旅游业、科技信息咨询业等新兴行业，提高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继续发展金融服务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形成以优势产业为主导的结构框架。

重点建设五街就是将经济发展与城市形态建设相结合，重点建设能代表西城区形象，经济活动集中，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又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西单商业街、金融街、阜成门至景山文化旅游街、平安大街和西长安街。

3. “建设六个功能街区”：

2000年西城区进一步深化了对区情特点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到西城区客观上存在着六个资源优势集中、特色突出、知名度高、发展前景好的街区：

具体说，要高水平建成北京金融街，把金融街建设成为环境优美、资讯发达、交易活跃、服务完善的

国际化金融功能区；

提升西单商业中心区品质，将西单商业区建成特色突出、业态丰富、环境良好、管理有序的综合性大型商业中心区；

做强中关村德胜科技园区，将德胜科技园建设成为中关村创意产业基地和中关村科技园第二个知识型服务业聚集地；

拓展西外旅游商业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努力建设集商务、会展、旅游、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功能区；

彰显什刹海传统风貌旅游区的文化魅力，努力建设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古都风韵与时尚生活相互融合的传统风貌旅游区；

深度开发阜景文化旅游街，全力打造文化底蕴深厚、特色商业氛围浓郁、配套设施完备的传统风貌旅游区。

4. “经济强区、文化兴区、环境优区”：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全区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在筹备全区第九次党代会前夕，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西城区未来20年发展应依托功能街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大发展，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努力打造一个集金融、商贸、文化、旅游为特色品牌的精品城区，塑造西城‘经济发展强区’‘文化繁荣大区’‘人居优化社会’的全新形象……区委领导研究后改为‘经济强区、文化兴区、环境优区’建设目标，定为‘三区战略’，两区合并后又改为‘服务立区、金融强区、文化兴区’新的三区战略”。这样在发展主体上把驻区单位和居民作为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西城区做好服务必须依靠的力量；在发展途径上，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在发展方式上要把积极主动服务与顺势促进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依法有序管理与共驻共建共享结合起来，把服务人民群众与动员全民参与结合起来，在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上，进一步强化了首都意识、

首善意识，提高区域人文化、精致化、数字化和国际化水平。

新三区战略得到全区上下高度认同，促进了西城区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

回顾西城区40年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城区委、区政府对区情的认识、对区域功能的认识是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

“繁荣西单、发展西城”，把西单作为一个商业的核心地区，是一个点的认识；“大力发展五业，重点建设五街”是“线”的认识，是发展西城的多条线；“六个功能街区”已是“片”的认识，即把全区划为六个功能区片，分别谋划、统一发展；“三区”战略已上升到“面”的认识，从整体上，从战略全局上认识区位特点，全面规划全区发展战略。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对区情、对区位认识是随着改革深入由点、线、片、面逐步上升，逐渐深化，成为全区改革发展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三区”战略使我们牢牢把握了时代赋予首都功能的战略定位，使全区经济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

201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16.9亿元，人均GDP达到41610美元，是全区人均GDP的2.4倍。

而1998年原宣武区GDP107亿元，财政收入7.075亿；原西城区GDP155亿，财政收入12.46亿。十年后，2008年原宣武区GDP303亿，财政收入44.22亿；原西城区1371亿，财政收入154.5亿。

从1998年，我们原来的两个区发展到现在已翻了十几倍。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西城区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全市前列。这些成果也是我们认识区情、明确区域功能定位而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目标的结果，是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努力奋斗、锐意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难忘北营房中街的户外水龙头

□ 汤学良

1971年，我家搬到西城区阜外大街北营房中街4号院，紧邻解放军报社印刷厂的一栋长方形新式排子房小院内居住，院里一共有七户人家，将近30口人共处一院，其乐融融。这里的人都很朴实、厚道，但称谓与我家原住的机关大院宿



1984年夏老邻居南大哥在北营房中街户外水龙头接水

舍不同，我们在院里称呼比父母年纪大的男性叫“伯伯”，比父母年纪小的男性叫“叔叔”，女性长辈统一叫“阿姨”。可这里的邻居叫比父母大的男性、女性为“大爷”、“大妈”；比父母年纪小的男性、女性叫“大叔”、“大婶”，让我很不习惯。

北营房原是明代驻军营房旧址，是专门拱卫阜成门的卫戍部队营房；清军占领北京后，满族八旗军中的正红旗接管了这座军营，沿用此名。北营房从中街划分成东西两块区域，每个区域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军营，因旗丁可以带家属，所以军营是以户为单

位形成的。我家居住的这个院落不属于北营房的老房子，是新建的一栋砖瓦房，是否旧房改造的，我不清楚。院子前排以南都是正红旗的老营房，错落有致、整齐划一，唯独可以区分等级的是房屋的高矮、砖料。中街居委主任何大妈在我院中屋居住，何家是正红旗老营旗丁的后裔，在北营房有很多直系亲属，辈分还很高，所以很受尊敬。而旗人的家教很严，五大三粗的何家子弟都很规矩，礼节还很重、讲义气，不像我们汉族子弟那么无拘无束的随意玩耍。

我们院里有位房管系统退休的赵大爷，身板非

常硬朗，一年四季光着上身，寒冬腊月也就是披着一件黑棉袄，扣子也不系，裸露着胸膛。赵大爷没有文化，据说“文革”时期街道请他忆苦思甜，他想说自己是“文盲”，结果却说成是“流氓”，成为街邻茶余饭后的笑谈。赵大爷喜欢喝酒，他喝酒与众不同，一头大蒜或者一根黄瓜当下酒菜，就可以喝半斤二锅头，而且一天两顿酒，不醉不休。我们院里有赵大爷在，大家尽管放心去上班、上学，他会保护全院的安全。赵大妈非常善良，据说精通巫术，她见我很消瘦，就用针线蘸上墨汁，从我的手掌虎口处扎过去，这是巫术中的“扎扎”，从此我就开始发胖，结果超过了我的身高体重，成了个大胖子，哈哈！

北营房过去是使用井水为饮用水和洗漱水，所以保留下二眼井、四眼井这些与水井有关的地名。因井水中有杂质，家家都要备存着明矾，把水缸灌满后，加入明矾净化水质，明矾有沉淀水中杂质的作用，沉淀后的水面向镜子一样明净光泽。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开始修建自来水厂，先是使用温榆河的地表水为水源，日伪时期改用地下水为水源，北京居民开始使用自来水。由于自来水出厂时经过加氯消毒和过滤，水质卫生可以得到保障，明矾的功能渐渐被人们遗忘。

北京自来水发展了63年，但北营房仍然没有实现水龙头入户问题。我们院和周边许多院落的邻居们公用中街一个水龙头接水，非常不方便，为此家家都备有水缸蓄水。我家初来乍到，也学着买了一口水缸和

两个水桶，开始向邻居们一样挑水灌缸蓄存水，以保障每日的洗菜、洗米、洗衣的用途，因姐姐哥哥都去了三线 and 兵团，我家的挑水就成为我的固定任务。

1975年我家搬离北营房，再次住进楼房，因单元楼全部实现水龙头入户问题，我家的水缸、水桶、水瓢因失去了作用而被遗弃，若能保留至今日，也算是现代文物了。

1984年我出任北京水史专题片总编导，一次途经北营房中街看望老邻居，出乎意料的是，我插队时期就帮助村长实现了水龙头入户，而且在全村开始普及，怎么居住在北京城墙边上的北营房老邻居们还在共用中街上的那个水龙头？也正是因为这个水龙头的存在，弥补了北京户外水龙头历史实物的缺环。为此，我将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我生活曾经息息相关的户外水龙头拍摄下来，并作为户外水龙头的典型收入北京水史专题片中。

2017年我再次途经北营房中街，北营房中街以东区域已经成为阜外医院大楼，我家居住过的4号院也在拆迁中荡然无存，老邻居们都不知道分迁到何处去了，从此天各一方失去联系。但我也为大家而高兴，因为北京的发展和时代变迁，老邻居们终于不用再挑水灌缸蓄水了，可以使用上单元楼的入户龙头，方便了生活。人老了，但旧时的记忆却无法从脑海中挥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北京最早的铁路在西城

——慈禧三海修铁路记

□ 刘江华

北京正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光绪年间慈禧在中南海所修铁路，长约2300米。

中南海向为皇宫禁苑，位于故宫西侧，故也称“西苑”，这条铁路的准确名称应该是“西苑铁路”。它包括位于中南海内的“紫光阁铁路”和位于北海境内的“二期铁路”。由瀛秀园起，经中海北门福华门，穿入北海西南门阳泽门后，沿北海西岸向北至“极乐世界”，再转而向东，经过“阐福寺”和“西天梵境”，最后到“镜清斋”（今名静心斋）码头前的车站。清政府在“西天梵境”的“华藏界”牌楼前还修了一段岔道，用于火车掉头。

很显然，这条建于禁园的铁路并非为商旅服务，也并非如众多传言所说的仅仅为了满足慈禧享乐之需要，它是和慈禧归政、光绪初年中国的修路大论战等军国大事密切相关。

李鸿章的良苦用心

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和平门至宣武门之间修建了一段长约1公里的示范小铁路并试跑火车，大力宣传铁路和火车。随后，清政府以“见者诧异，谣诼纷起”为由拆除了。

中国大地上最先出现的正式铁路，是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擅自修建的长15公里的吴淞铁路。线路通车后不久，火车轧死行人，引起当地百姓的激烈反对，清政府备款赎回后又予以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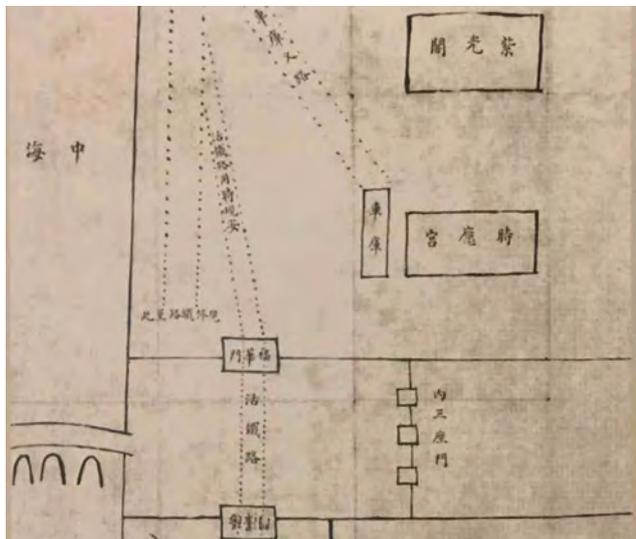
1879年，为把煤从矿区运到最近的海口，然后装船送出，供应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支持的开平煤矿公司请求建筑一条从唐山到北塘的铁路。项目被清政府批准，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被撤销了。开平煤矿公司不得已，只好把铁路线缩短，仅修唐山到胥各庄（今丰南县）一段。这个新的请求总算勉强被批准了。

唐胥铁路长10公里，1881年初开工修建，同年6月9日开始铺轨，11月8日举行通车典礼。清皇室的东陵就在唐山西北不远的地方，清政府生怕火车头“震动山陵”，最初只准用骡马拖拉车辆，经李鸿章多次斡旋，才在1882年改用机车牵引。

1886年7月，慈禧宣布将于第二年归政16岁的光绪皇帝。为给归政后的自己营造一个颐养享乐休憩之所，此前一年的6月21日，她亲下懿旨，启动修缮南海、中海、北海（习称“三海”）工程。除修葺原有建筑外，重点兴建仪鸾殿一组建筑群作为其日常起居的寝宫。

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中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不敌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鉴于海军力量的薄弱和沿海各省海军各自为战的局面，清政府于1885年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相当于海军部）统一指挥全国海军，并以“铁路开通可为军事上之补救”，由该衙门监督铁路事务。

在此背景下，唐山到芦台再到天津的铁路陆续建成，李鸿章趁机提出将铁路从天津修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即“津通铁路”。此举遭到包括户部尚书翁同龢



“北京中海福华门内修造车坞、铁路尺寸图样”局部

等人的强烈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铁路从天津延长到北京附近后，一旦外国军队从大沽口登陆，就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北京，攻进清朝统治的心脏，这无异于“开门揖盗”。李鸿章等虽然极力陈述津通铁路足以“增固海防”，但终不能消除清皇室的顾虑。

西苑铁路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三海”工程由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总负责。奕譞还是海军衙门总理大臣，李鸿章便利用自己海军衙门会办大臣的身份，争取奕譞，说服慈禧，得以在西苑修建铁路。此举，是为了让身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体验火车的便利、支持国内修建铁路，可谓用心良苦。

分两期修筑，安三段活铁轨

经过三年紧张施工，到1888年5月，三海工程先后竣工。就在三海工程接近尾声之际，西苑铁路开始铺设。

首先动工的，是紫光阁前全长一华里半的路段，时称紫光阁铁路。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北京中海福华门内修造车坞、铁路尺寸图样”及其贴说，该路全长257丈。以清营造尺一尺合0.32米计算，共长822米，约一华里半。

紫光阁铁路建成日期，以前文章尚付诸阙如。《翁同龢日记》1888年12月8日记载，当日直隶总督李鸿章进奉六节车厢，日记还有“今紫光阁铁路已成”之语。因此，以往多据此推断紫光阁铁路建成时间为当年12月。但据清宫档案，紫光阁铁路建成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当年11月27日火车车库合龙，醇亲王为此奖赏有关工匠，“头目每名赏钱四吊；匠人赏钱二吊至四吊；壮夫赏钱一吊”。车库建成，意味着紫光阁铁路基本修竣。

车库位于中海紫光阁北的时应宫旁，用于检修和存放小火车。为此专门设计了一条岔道，直通车库。根据现存舆图，车库有11开间，进深约有5米，每间各宽约3.5米，总长不到40米，确实是小型车库。

只有822米长的紫光阁铁路，自然无法展开火车。为此，慈禧下旨修建位于北海内的西苑铁路二期工程。

西苑铁路二期沿北海西岸和北岸延伸，路基工程复杂，加上火车不能拐小弯而必须拐大弯，因此除了铺垫增宽泊岸、开创有碍土山、挪修取直道路外，还要砍去不少树木、添修大小涵洞和石平桥等。为此，动用了驻扎在西山的健锐、火器两营的士兵。全线贯通后，在终点镜清斋还修建了黄瓦顶的小型火车站站廊，至于起点和终点两站台，则为灰土砌成。

二期铁路的开工日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奉宸苑记事簿》，由风水先生所定。1888年12月13日，总管太监李莲英口传慈禧懿旨：“自福华门、阳泽门起，西泊岸添安铁路，量度地势办理。”经与李莲英相熟的风水先生何英年踏勘，由阳泽门至极乐世界段于1889年1月14日动工；极乐世界至镜清斋一段，因“本年方向不宜”，则在春节之后的2月9日开工。

据清宫所藏“北京北海至中海铺修铁路图样”及其贴说，北海内铁路总长472丈，合1510.4米。加上此前修好的紫光阁铁路，可知西苑铁路总长2332米，共4.7华里，而不是广为流传的三华里多。

这2332米铁轨中，包括四十九丈二尺（合157米）活安铁路。所谓“活安铁路”，就是当小火车通行的时候及时进行组装，不用时可立即拆掉。它共分为三段：一段在福华门（原中海北门，与阳泽门相对，今已不存）内；一段在福华门与阳泽门（今北海公园西南门）之间；另一段则横跨于阐福寺前的神路上。

福华门、阳泽门之间为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平时车水马龙，又是西苑铁路必经之地。铁路固定安装，车马人流就会非常不便，故设计者采用了“活安铁路”。此办法虽麻烦，但便于东西向来往。横跨阐福寺神道的“活安铁路”长约14米。之所以也要做此设计，是因为阐福寺为清帝每年旧历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举行“书福”盛典、祈求苍天赐福之所。举行典礼之日，定要拆除铁路，故也采用“活安铁路”。

法国人不计成本进奉

西苑铁路所行驶的车头和车厢，均由法国所制、当时颇为流行的丹特型。纵观其站台与回车路的



民国时期，西苑铁路遗址

布置、仅6尺宽的路基、总长不及40米的车库，可断定该路为一小型窄轨路，比今日标准车厢的1.435米轨距要小得多。

1888年12月13日，户部尚书翁同龢参观了李鸿章此前一天所进的车厢——约长三四丈，狭长，对面两列，可容28人。第二年1月26日，醇亲王奕譞向慈禧奏报：已运抵北京的有“丹特火车一辆，并铁轨七里余”，以及“坐车六辆”，皆由法国新盛公司承办。这六辆坐车中，一辆是“上等极好车”，还有两辆“上等车”、两辆“中等车”和一辆“行李车”。据奕譞此折，所进机车，车辆材质光洁、设备华美、制作精工。

铁轨和机车原由天津海关向法国新盛公司订购，订价银为6000两。但据清政府驻法国领事林椿通报，6000两银子与工料运费相差甚远，随即由法国银行监督登飞筹款，新盛公司赶制，在巴黎工厂加工后装箱海运来中国。生产厂家的监工雷逊亲自指挥生产及安装。

法国商人为何愿意“不计资论值”报效？原来，光绪年间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修路等治国之策一直为西方列强所关注，他们随时准备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

早在光绪初年时，英国人就要求享有对中国承贷铁路借款的优先权，并曾打算送给光绪一条短短的铁路作为结婚礼品，藉此使铁路得以在中国流行。只是，清政府拒绝了此“美意”。美国人则从国内搬来了全套能够运转的铁路模型，在天津直隶总督署展

览。

西苑铁路的修筑，给了法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的绝好机会。法国的小火车和铁轨得以在中国的皇宫内苑行驶是在当朝掌权者前上演铁路的活动广告。慈禧收下这份礼物后，也不忘投桃报李——赏给法商诸人以三等宝星，并加三品顶戴。

宝星是晚清功勋制度之一种，共分五等，根据1881年正式颁布的《奖给洋员宝星章程》，外国商人一般是颁给第五等宝星勋章。慈禧一下子就给法商颁三等，可谓破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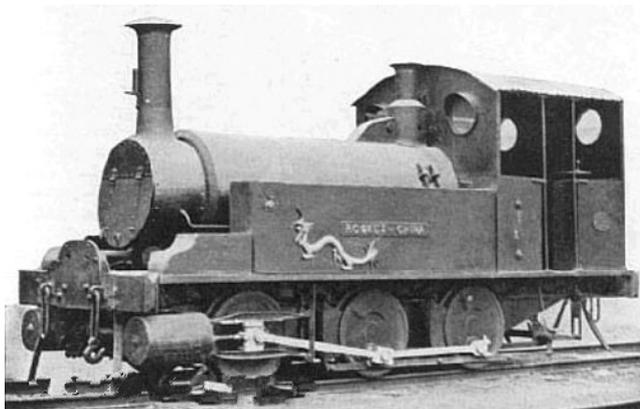
慈禧上下班“通勤线路”

据清宫《奉宸苑记事簿》，西苑铁路于光绪十五年全线通车。当时慈禧太后移驻西苑，以仪鸾殿作为寝宫，勤政殿作为接见群臣议政之处，北海镜清斋作为临幸别墅。每天上午，她从仪鸾殿到勤政殿上朝，中午散朝后稍事休息，就偕同光绪皇帝及王公大臣乘小火车到镜清斋用膳后睡午觉。

从1888年5月搬进，到1891年5月颐和园修竣这三年，慈禧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中海仪鸾殿。就是后来常驻颐和园，她也不时进城居住仪鸾殿，尤其到冬季，更以居仪鸾殿为主。可以说，她三年间几乎每天都要坐小火车，西苑铁路成其“通勤线路”。

李鸿章所上六节车厢，本有一节是给醇亲王奕譞的。奕譞未敢擅留，全部进献给了慈禧。后来，慈禧选定了三节车厢组成小火车。

她和光绪皇帝乘坐的上等豪华客车装饰黄绸窗



西苑铁路的火车头，装饰有黄龙旗上的龙图案

帷，宗室外戚坐的客车是红绸窗帷，大臣乘坐的客车则是蓝绸窗帟。每次行车时，铁轨两边在慈禧和光绪乘坐的黄绸窗帟客车前，要由两队太监手持幡旗仪仗，导车前行。

通车不久，慈禧惧怕机车的轰隆汽笛声会破坏皇城内的风水和气脉。于是，每次行车时不准用机车牵引，改为每节车厢拴上绒绳，各由四名太监拉着前行。当年有诗描绘此情形：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飘轮直过福华门。

御用铁路毁于八国联军

修三海工程共费银571.4万多两。最初，由慈禧下令粤海关监督筹款一百万两作为启动经费，此款未到之前，先由神机营借垫。后来，需银浩繁、银钱不继，负责工程的奉宸苑多次向海军衙门、户部借款。他将海军衙门所借洋款尚未用完的40万两挪去，但只归还了7万两，之后又让海军衙门筹垫12万两。

1886年12月，醇亲王奕譞急于要得到100万两银子支付西苑修建费，曾致函李鸿章诉苦说：不催厂商加紧工作，怕延误工期；要催厂商，各商便反过来纷纷催讨工款，加上又不愿负“借洋款修禁苑之名”，万不得已只好求李鸿章帮忙，提出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的名义，借洋款80万两，以救急需。直至1891年，此时距三海工程结束已三年，还欠工料钱等六七十万两。

启动修葺三海工程的1885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此，包括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在内的多名官员曾奏请暂行停罢三海工程。三海工程即将完工的1888年底，故宫贞度门失火，殃及太和门，慈禧不得不于四天后宣布万寿山颐和园工程除正路和佛殿外暂行停罢，但三海工程继续。

据统计，整个三海工程共动用工匠1.2万多名，调动了京师16家木商。由于皇差如命，工价低微，工匠无法生计，致使先后发生过多起工匠罢工事件。有关部门在将参与罢工的头目判刑之余，还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官兵到运料门外弹压，1886年又在西苑门设立公所，派官弁值班。

为修葺三海和兴建仪鸾殿等，中南海需向西扩展地盘——由李鸿章出面，赔偿银35万两，并以西什库地面交换，换得法国建在蚕池口的天主教堂和百鸟房；又筹拨十余万两银去收购中南海西侧的住户、铺户的房地产。看来，今天位于西四的西什库教堂，和修葺三海工程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苑铁路修成12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京西逃。八国联军对这条御用铁路尤其是北海部分进行破坏，拆毁了大部分路段，并将慈禧御用火车的火车头和部分“活安铁路”弄到前门公开展示。

1901年夏，美国旅行家伯顿·霍尔姆斯从莫斯科来到北京旅游。当他乘坐马车经过前门瓮城时，注意到瓮城内西南角摆着一列小火车。他写道：“在左边我们能看到一列皇帝的专属小火车，以前它载着皇帝在西苑里跑来跑去，而现在却被弃置一角供老百姓遮风挡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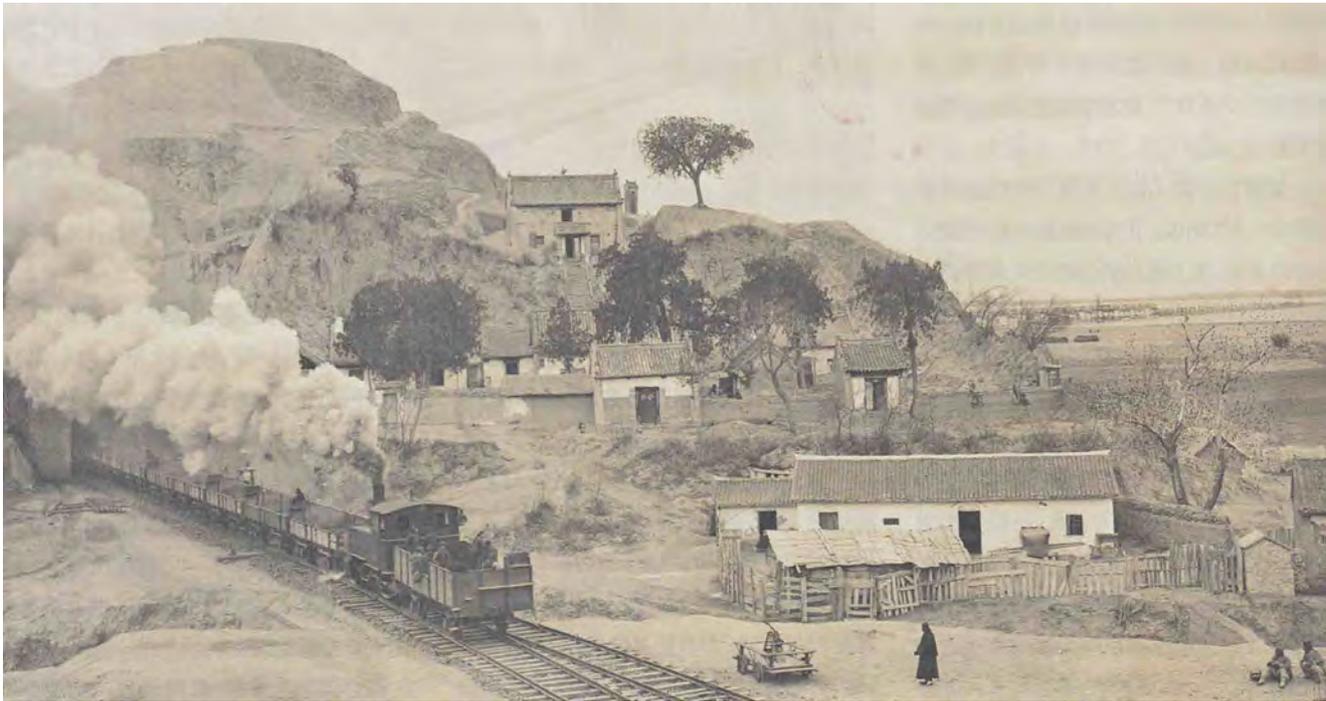
至于慈禧所居的仪鸾殿，也被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所占据。1901年4月17日深夜，仪鸾殿突然起火，“烈焰凶猛，半天皆红”，瓦德西的参谋长、陆军少将许华兹何甫被活活烧死。事后查明，大火是因德军临时设置的厨房炉火引燃壁上木皮纸而起的，慈禧精心修建的仪鸾殿化为灰烬。

慈禧的小火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02年1月3日，慈禧、光绪从西安回銮北京，开始重修西苑。据清宫档案，当时初步估算的维修和重建费用需银200.96万两，这还不包括添置家具摆设等的费用。

尽管《辛丑条约》议定赔款达4.5亿两，尽管每年要偿付本息2000多万两，但慈禧依然要重新修葺三海。最后，在原仪鸾殿旧址上改建海晏堂（后改名居仁堂），又在海晏堂西北修建新的仪鸾殿（今怀仁堂）。至于中海火车库房铁道等重修花费，据当时估算，共需银1.7万两。

1911年，此时慈禧已逝，继任的隆裕太后和溥仪也想重温当年慈禧和光绪的乘车之乐，谕令迅速将中



佳士得拍卖品《中国铁路总公司承造中国铁路比公司京汉铁路1899-1905》其中一幅，法国外交官吕班Georges Dubail（1845-1932）旧藏，传由慈禧太后于1905年前赠与藏家

海、北海铁路和机车修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当年管理奉宸苑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旨饬令度支部筹拨修复西苑铁路银两的奏折。其中表明：查得应修路段为7段，应修大小车辆13辆，应购置铁轨、道岔底座、铁道摆钩、搬闸、千斤等器件多达几十种。整个修复工程共需银11万两。

万万想不到的是，修复工程尚未动工，武昌起义爆发，修路遂成泡影。

西苑铁路的开通，果然打动了慈禧太后的心，让慈禧见识了火车的便利。中国修建铁路的速度大大加快：通车当年的1899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兴办铁路；1905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铁路南北分段通车。

终有清之世，总共建成的铁路为9300公里左右。英国到1890年铁路总里程达到32000公里、法国到1870年铁路总里程为17400公里，中国相比之下仍有很大差距，但可以说进步不小。

1925年北海开园以前，残余的西苑铁路被拆除，存放于园内。1945年战败前夕，长期战争使得日本战备资源极度匮乏。为此，日本领事馆曾密令北平伪政权，以收缴废钢铁的名义，从北京各处收敛钢材、金属器皿等。此番被收缴的，就包括西苑铁路的废弃钢轨。史料记载：“收北海钢轨四根，共六百八十斤。这些都是原西苑铁路的钢轨。另外还有十八根钢轨在蚕坛等处盖房时被使用。”

今天，在北海小西天东南角亭和五龙亭之一的滋香亭间，可以明显看出路下有六个方形水洞，水洞上面铺石为路。这几个涵洞，就是西苑铁路修建时铺架的铁路桥，也是西苑铁路留下的唯一遗迹。后人将这里称为小火车桥。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建设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曾将位于北海的西苑铁路小火车头调到水库工地，用以拉带拖车、运送土方材料。当时的新闻曾报道说：“慈禧太后的小火车，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冬储大白菜的记忆

□ 原启长

老北京人都曾有过这样的记忆：每年一到初冬，储存白菜就成为北京人生活中既重要又麻烦的事情。过去，北京冬季蔬菜品种少，因此价格低廉、易贮存的大白菜成为当年居民饭桌上的“当家菜”。千家万户齐出动，买菜、晾菜、贮菜，成为一幅繁忙而有致的风俗画。

每年冬天，首都百姓家家户户总要存上足够数量的大白菜，心里才觉得踏实。一到11月上旬，大白菜集中上市时，许多家庭都是全家出动，顶着寒风、排着长队等候购菜，少则上百斤，多则上千斤。双职工家庭白天上班，买菜只能安排在晚上。由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市委、市政府视大白菜为“政治菜”，年年都对冬贮白菜实行统购包销，计划管理。

陈云同志关心冬储大白菜

冬贮白菜的供应工作涵盖收贮运销多个环节，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冷空气的突袭，难免会出现砍收不及时、供应不足或冻菜、烂菜等问题。这一问题，曾引起过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关注。1982年10月，在大白菜即将上市之际，陈云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指出：“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在10月25日写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中，陈云又强调说：“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因为菜‘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陈云的意见引起了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将陈云的信批给中央有关方面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为落实陈云的意见，解决市民大白菜过冬的问题，北京、天津两市立即行动起来。北京市还成立了专门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冬天的主要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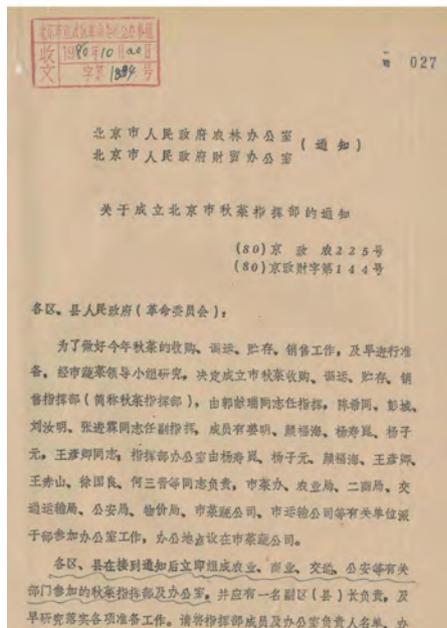


陈云同志对大白菜过冬提出意见

一场因白菜引发的“战役”

为统筹领导冬贮白菜集中上市工作，当时北京市专门成立秋菜指挥部，一般由副市长挂帅，农业、商业、交通、公安、气象等部门的领导参加。在10多天的时间里完成几亿公斤大白菜的砍收、运输、销售和贮存，犹如进行一场紧张而忙碌的战役。在大白菜集中上市的十天半月内，全市每天投入采购、运输、出售大白菜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三万多人。且不说销售的白菜数量有多么巨大，就是每天落下的烂菜帮子，就得用无数解放牌大卡车来清运。那年月，可是忙坏了国营蔬菜公司、副食品商店和交通、环卫部门的工人师傅们。

大白菜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了各行各业的支持。为不影响白天的交通，在晚上十点以后，马路各条主要路口都有交警在值勤。一到深夜，城市的街道上



就塞满了运菜的卡车、拖拉机、马车，由交警指挥，让菜车先行，其他社会车辆让行，保证一路运输的通畅。同时，环卫部门也要打扫干净沿途遗撒的烂菜帮菜叶。高峰年份，每天动用的汽车将近一万余次，运进白

菜，运出菜帮和菜叶。一年的总运输量超过30万吨。

冬储白菜销路好 排队见首不见尾

每年到了11月，就像战备动员似的，从政府到国营蔬菜公司、副食商店、交通部门、环卫部门，到机关单位、普通百姓，都会动员起来，甚至单位会允许

职工请假回家买白菜。那时的菜店及售菜点，门口都挂着红布标语，街上满载大白菜的汽车来来往往。白菜上市前，物价局已经对大白菜进行了分级定价。当时的大白菜一般分三级，一级菜瓷实，包的紧，

没有老帮，像个小胖娃娃。二级菜就是有点大帮，一掐有点软。三级菜就是帮多，芯小。还有等外菜，就是散了，有点像青口菜那样。白菜一被运到，就按照分级来摆放，马路边、胡同口的大白菜堆成了小山。上面分别立个牌子，写着几级菜，一目了然。售货员系着蓝布围裙，戴着白套袖，忙着卸车、整理、分级、码放。

一般运送大白菜的车都是周六夜里来，到了周日就看胡同里的老老少少都在菜站前排队。说到排队，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里，未曾在寒夜中排过买白菜长队的大概没有。那时北京的冬天，都刮西北风，零下10几度，人们都裹着棉大衣，有的跟着排队的小孩儿都被冻哭了。有几年冬天，来大白菜时正赶上下雪，人们站在雪中，脸冻得通红，活像个“雪人”。记得过去家里排队买菜的事都由我和妹妹管，主力是我。那会儿为防着有人排队加塞，一般都由我们小孩儿们先过来排队，等快排到了就叫家长去，我们这几个小伙伴借此可有聊天的机会了，互相聊聊今天看哪本小人书了、最近看什么战争片等等，也不觉得冷，有时甚至都已经排到了却忘了叫家长。

最热闹的时候是菜站的售货员进胡同。一看卖菜的售货员来了，这队就显得有些乱了。售货员们推着地秤，一进胡同口，大家就追着售货员走，每



1988年11月12日，一名儿童在北京一个冬贮白菜售卖点帮助大人搬白菜

子。一般一个擀皮儿，供着好几个人包。在这一年一年的包饺子过程中，大人们渐渐老去，孩子们也慢慢长大了。

在冬日漫长的时间里，这些都是昔日北京寻常百姓家中天天都离不开的味道。

大白菜的价格轻易不能放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物价整体水平逐渐上涨，但白菜的价格却很少变动，这当然是因为政府给了补贴在里面。

从1985年开始，北京的蔬菜市场初步放开，蔬菜不再全部实行统购包销，蒜苗、菜花、空心菜、韭菜等“细菜”价格陆续放开，政府只统购包销市场上80%的蔬菜，其余20%可以自由销售。全市千余个零售菜店全部转成集体经营，除了接受国营批发市场分配的货源外，各个菜店还可以自行采购紧缺商品。但大白菜仍然延续全部统购包销的老办法，价格岿然不动。

1987年，有关部门计划再进一步放开蔬菜价格。没想到，消息一出，就引发市民排队抢购蔬菜的浪潮。那年冬季，尽管政府通过各个信息渠道一再向市民保证“大白菜价格不会变化，供应量充足”，老百姓还是放心不下，买大白菜的队伍在一夜之间增长了许多。不少百姓裹着大衣，带着马扎、板凳，在寒冬的浓雾中蜷缩着等待买菜，几百人的长队毫不稀奇。到了1988年，因为气候原因，大白菜产量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北京市民的白菜抢购潮愈演愈烈。

看着寒风中伫立的买菜队伍，又一次让政府决策层意识到蔬菜价格事关重大不可妄动。在当时的形势下，改革虽是必须的，但也要慎重，不能让占大多数的百姓承受改革代价。为此，在随后几年里，其它商品的价格或有浮动，但大白菜价格始终固守在6分钱一公斤上下。即便其它蔬菜早已没有了财政补贴，由政府财政补贴的大白菜仍然每年在京城集中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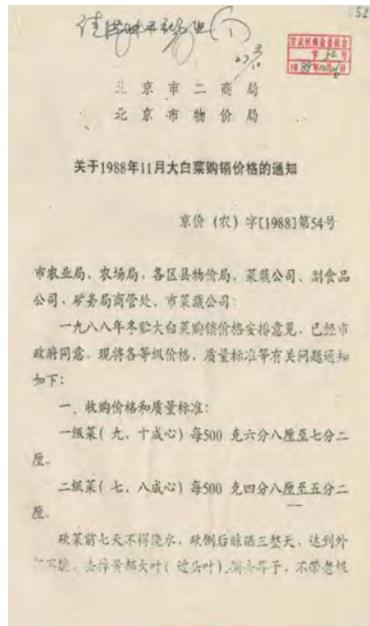
1988年冬,北京市民排队购买白菜

大白菜变为“爱国菜”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的繁荣和物品供应的丰富，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冬季购买大白菜的人少了很多。到了1989年，大白菜还曾遭遇了一次被“抢救”的命运。

那年赶上多年不遇的暖冬，地里的大白菜长得格外茁壮，等到收割季节，8万吨大白菜一下子成了卖不动的积压货。市政府不得不紧急动员全市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购贮大白菜。有的单位直接把大白菜买回去当作福利分给职工。有的单位是职工买了白菜后可以报销，连市长都亲自到菜站推销白菜。当时的大白菜有着非常神气的别名，在遍布京城大街小巷的菜站里，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黑板上大大地写着几个字：“爱国菜”。

那一次的大白菜滞销危机，在行政力量促销下得以度过。从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大白菜雄霸北京人冬令



北京市二商物价局关于1988年11月大白菜购销价格的通知



原宣武区秋菜指挥部1989年秋菜贮存工作情况简报第十五期：“积极响应市、区号召踊跃购买冬贮大白菜”

餐桌数十年的地位，开始泯然于其它蔬菜。

大白菜逐渐退出“当家菜”的舞台

1990年，大白菜的销售方式第一次发生变革，从这一年起，不再完全实行统购包销，农民的自产菜允许进京销售。装满白菜的板车或农用车开始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这些由菜农直接装车贩卖的白菜可以随便挑拣，又能在家门口直接买，不需要排队，虽然价格比冬贮菜贵出一倍，还是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这一年，买菜的队伍又在11月初准时排起，但明显短了许多，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没有排队的情况，菜站里堆满了待购的大白菜，随到随买。

带来更深刻变化的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时年88岁的邓小平在南海边一锤定音，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年底，北京的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不再采用政府定价的方式，全部由市场决定。但此时，大白菜是唯一一种没有彻底放开价格的蔬菜。每年11月，政府依然要组织一批冬贮菜集中上市，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



近年来，西城区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陆续在各个街道建立起百姓生活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民生服务

当时，普通市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已有明显提高，集中上市期每公斤便宜几分钱的冬贮菜已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这一年，“秋菜指挥部”调配的大白菜数量第一次明显下降。

此后，大白菜受到的冷落一年比一年明显。1997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接近1000万，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冬贮大白菜的销量萎缩到不足一亿公斤，大多时候，菜站里堆积着政府高价补贴的大白菜却无人问津。到了1998年，北京一年一度的“秋菜指挥部”也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北京人正式和每年冬天集中买冬贮大白菜的历史说“再见”了。

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式各样的时令蔬菜供应充足，四季常新。过去的菜站被大大小小的超市、便利店所取代。昔日作为“当家菜”的大白菜也已成为“平常菜”，和其他各种蔬菜瓜果一起摆上市场柜台，丰富着老百姓的餐桌。

我所结识的三位西城人（三）

□ 王宝升

（接上期）

文物的守护神——王和平先生

王和平先生是原西城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与他相识及交往则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与西城区文化文物局共同合作搞西城区胡同街巷标志牌工作之缘故，也是我接触到的第三位西城良师益友。

1990年为了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西城区政府决定对区域内具有代表性和历史价值街巷胡同，悬挂半永久性的纪念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与西城区文化文物局商议共同合作承接这项工作。4月初，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秘书长常华先生通知我说，学会与西城区文物管理所共同合作，组织部分理事及会员为西城区撰写胡同街巷标志牌工作，请我去参与其文字编写工作。4月28日我参加了王和平所长召开的编写西城区胡同街巷标志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有学会秘书长常华、冯其利、陈家骥、王永斌先生……6月9日，在西城区外事职业高中（220中）召开了胡同标志编写研讨会。由于当时我还在粮食部门工作又地处丰台区，所以分配我负责撰写的是“西交民巷”“南闹市口”等几处地名的编写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终于完成了这些胡同街巷标志牌的编写工作。

由于编写胡同街巷标志牌工作的缘故，我与王和平先生相识并经常到他工作单位，位于西城区按院胡同的文物局交谈。王和平先生从事文博事业几十年，对工作兢兢业业。特别是对文物保护工作认真负责，加强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措施。同时，为了宣传保护文物不辞劳苦，调查收集和编写了有关区域内文物方面的历史资料，被称为文物的守护神。

与王和平先生接触一段时间我感到，他待人热情无私。记得我每次到文物局拜访，他都赠送给我许多有关西城区文史资料及文物保护单位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了解西城区情及历史文物等方面有很大的学习参考作用。

难以忘怀的是他曾经为我收集《北京文物报》而费劲辛苦寻觅报纸的一段往事。

1989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张嘉鼎先生介绍我给《北京文物报》投稿，我自己曾经在该报发表过几篇稿件。由于是由市文物局创办的内部报纸不对外销售，我又是居住丰台花乡地区，与当地文保所没有联系，而且我还在粮食部门工作，因此不能每月到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市文物局领取报纸，致使一段时间的几期报纸寻找不到了。我为了收集《北京文物报》便于学习参考，曾经向该报主编胡玉远先生求教。胡先生说，报纸印刷数量比较少，领取的单位很多，这里已经没有留存。最后我找到王和平所长请他帮助，王所长要我到辅仁大学帮我解决。七月盛夏的某一天，我到辅仁大学的一处临时办公室内见到了王所长，他热情接待了我，并且不顾炎热翻箱倒柜终于帮我找到遗缺的《北京文物报》，使我如愿以偿。王和平先生这种热心精神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我与三位西城人交往的事情虽然平常无奇。况且陈家骥、常人春二位先生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刻苦钻研精神以及给予我在学习上的许多热情帮助，我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完）

“十年湖海 一肩风月”

——爷爷张恨水的晚年生活

□ 张纪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介绍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正是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一些关于爷爷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爷爷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提供了很大帮助。

那是在天津曹禺故居，我当时正参加博物馆日活动，收藏爱好者贾俊学向我展示了他捡的漏——“文联旧档案”，一些他从旧纸堆中捡出来的“文物”。20世纪90年代，北京几家出版社和中国文联搬家，有些旧档案就被当废纸卖了，贾俊学用不多的钱买了几麻袋，以后的每天，他都会仔细地阅读这些旧档案，着迷于旧档案中的人物。十几年下来他竟然整理出了300多位文化名人的口述实录，其中有中国文联干事对老舍、张恨水、沈从文、曹禺、陈其通、蓝马、欧阳山尊、田汉等人的访问纪要。因为有我爷爷的专访，他赠送我一部分“纪要”。看到爷爷与中国文联沈慧等同志的谈话，我感觉是那么亲切，爷爷的一言一语再次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

竭智尽忠（1949—1956）

爷爷是个有钱潇洒、没钱苦日子也能过的人。从他的自传文字中，我看到他青年时期离乡背井、闯荡江湖的艰辛。在上海时他大病一场，寒冬腊月只能当了棉袍子买药吃。他也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1919年，爷爷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怀宁会馆，不久《时事新报》驻京办事处聘用了爷爷，并提前发了月薪10元工资。除去还债和饭费，兜里还有一元大洋，爷爷悠然自得地逛街去，竟然用全部的家当买了戏票，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的联袂演出。他的这一“豪举”后来被文艺界的同仁笑称“一元看三星”。爷爷曾经说过：“只要不怕穷，还有什么可怕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这种达观的人生理念，也影响了我的父辈和我们。“流自己的汗，吃



青年张恨水

自己的饭”成为我们家的家训。

1949年初，北平《新民报》一版刊登了《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宣布解除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的一切

职务。这是悲哀还是庆幸？爷爷是最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报馆经理的工作又是千头万绪，全体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这对于爷爷来说有些疲于奔命，不当这个经理也罢。但紧接着，给他更大打击的是《新民报》总编辑王达仁写的一篇文章。王的《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一文，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这对爷爷刺激很大。没过几天，爷爷在家里辅导我两位叔叔课时，因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导致中风，被送进了北京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的所有写作都终止了。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卖了一套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一套小院。爷爷一旦停止了写作，家里的生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爸爸和几个叔叔都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爸爸是家中长子，他1948年考取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华北大学是一所从延安过来的革命大学，不仅管吃管住，还发军装发工资。共和国刚刚成立，急缺人才，爸爸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读书了，本科只读了两年就开始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就毕业留校给苏联专家当助教。一切从简，一切

从快，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爸爸参加工作后，将我奶奶、小姑姑接到人民大学。二叔张二水考取了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我曾经问二叔为什么选择石油专业，二叔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是国家最专业的专业。”三叔张全，17岁就考进长春电力专科学校。四叔张伍1951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们哥儿几个考的都是包吃住还不用缴纳学费的学校，那时候我们都想尽快独立，尽快减轻你爷爷的负担。”二叔对我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关心爷爷的创作与生活情况，中国文联也常常来人到我家嘘寒问暖。爷爷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让爷爷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的变化，他满腔喜悦地写下了中篇游记《西北行》，刊于1956年的上海《新闻报》。1954年，爷爷还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准备写一篇北京解放后巨大变化的文章。于是他拄着手杖，乘坐三轮车，遍游北京十三座城门，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写出了一组散文，在海外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6年1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茅盾把爷爷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头戴新疆帽，微笑着和爷爷握手说：“还记得，还记得。”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曾经单独会见了爷爷，两人进行了长谈。在这次政协会上，周总理再三询问爷爷的生活情况，指示文化部给爷爷一定的生活补助，这让爷爷很感动。爷爷中风很快得到治疗，



1956年1月，毛泽东与张恨水（右一）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

恢复得很好。他根据民间故事改编了《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白蛇传》《秋江》《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这是在脑溢血后遗症的状态下完成的，足以见到他的意志和才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约稿一直不断。

逢礁避让（1957）

1957年这一年，爷爷的一项工作是校对他的长篇小说《翠翠》。这是一部以元朝故事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长约60万字，打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爷爷将这部书稿先交给了我爸爸张晓水做第一读者。爸爸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教员，爷爷把书稿交给他的长子来把政治关，这是最合适的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大学校址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人们习惯称它“铁一号”，学校距离爷爷住的砖塔胡同很近。爷爷给我爸爸买了一辆飞利浦自行车，爸爸骑着这辆自行车往来于铁一号和砖塔胡同很是方便。每当夜幕降临，爷爷将自己埋在灯光下，进入了他的写作世界，爸爸就坐在旁边看书。夜半时分，胡同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这时候爸爸会跑出去，买上一个烧饼夹酱肉、一碗馄饨，趁着热乎劲儿给爷爷端去当夜宵。

我家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安装有抽水马桶，但没有洗澡设备，爷爷每次洗澡都是我爸爸陪着到西四的澡堂子。泡完澡，爷俩叫上一壶茶，爷爷这个时候很愿意听爸爸讲讲政治形势。爸爸很委婉地说，《翠翠》这部长篇小说爱情部分还是多了，千万别被当做黄色小说受到批判，他有这个担心。既然我爸爸都认为这部《翠翠》描写爱情部分多了些，那就删吧，爷爷将自己的作品迫不得已删掉了一多半，60万字的长篇只剩下了20多万字，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时隔60年之后，我四处打听那部20万字的《翠翠》，但已经无人知晓它的下落。

爷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在这一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书写于1947至1949年，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未完中断，停止连载。爷爷被迫停止连载的小说很多，或由于战争原因稿件邮寄不便，或

是因政治审查，或是因为稿费纠纷，他的100多部中长篇中有29部是夭折的半成品，《五子登科》也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

1957年，爷爷得以将《五子登科》这部小说写完，并且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件好事。《五子登科》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的接收大员的腐化生活。接收大员的权力处在只有奉承没有监督的状态下，一些汉奸把接收大员安排在朱门巨宅中，竞相使出美人计，接收大员便利用职权在北京和重庆之间走私黄金，等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统统到手后，他们便跑到上海当寓公去了。爷爷巧妙地将教子有方的历史典故加以画龙点睛，概括出腐朽政治中的人生类型。《五子登科》谴责性的题材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热点，这本书名气随之大涨。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单行本，流行更加广泛。多少年之后，我的一位文友大哥见面就说，看过你爷爷写的《五子登科》，写得真好！

在这一年，爷爷主要创作的作品是《记者外传》。这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以他“北漂”的亲身经历为素材，通过主要人物——新闻记者杨止波从安徽到北京的谋生经历，反映民国初年北京社会众生相，与他的《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一样，可当作民国初年的野史看。创作前，爷爷认真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工作，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原本是要写上、中、下三部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终因身体不佳，精力不济，改成写上下两部，以每个月6万字的速度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写到第30回，政治风云变幻，又遭遇停载，好在这30回的《记者外传》改革开放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了。

这三个长篇得到了预付稿酬几千元。我们家的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爷爷就给文化部写信，表示不要每个月150元的生活补助了。有人说，1949年后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而张恨水就是一个。

这一年，《羊城晚报》约爷爷写一部长篇连载小说，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曾经同时写七部连载小说的最高纪录再也无法保持。《北京漫画》要爷爷写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他哪里敢答应，果断拒绝了编辑



位于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的张恨水故居（已于2005年拆除）

的请求。他是这样说的：“新社会的事物是不应该随便讽刺的。”我现在琢磨这句话，觉得为了一大家子人，他自然会把持好人生行驶的船舵。但在涉及人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又有着鲜明而倔强的性格。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中，有人让爷爷做批判发言，爷爷说不认为胡风有什么错误，他拒绝发言。

1957年冲击荡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社会的复杂让你不能回避，也无法不开口。爷爷对访问他的文联同志这样说：“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没有什么可争的了。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很好，我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什么都能反对，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我是不赞成的。不要共产党领导，要哪个党来领导？”

这些话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过人之处，他用报人客观的眼光看社会，经历过几个朝代的切身比较，他对共产党是发自内心拥护的，这是肺腑之言。那么在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爷爷说了什么呢？我曾经问过爸爸，得到的回答是：“在文风改进上提了一些建议，比如现在欧化句子太长，太多，不利于工农兵阅读，还是应该多用短句子。”这些言论和其他高级别统战对象的言论经过摘编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红）在这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几乎断炊，他找到爷爷借钱。爷爷拿出了15元，送给李红先解燃眉之急。在生活上，爷爷其实自己刚刚摆脱困境，但他已向组织上为李红请求，看看能否给他想想办法。在文联同志访问的时候，爷爷为

孙福熙仅在鸣放中写了一篇《请以我为例》就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鸣不平，向文联提了意见。在自身难保的1957年，能够为朋友说句公道话，已经实属不易。

1957年8月15日，我出生了，这天凑巧是我爸爸张晓水和妈妈周维兰结婚纪念日。当妈妈把我抱给爷爷时，爷爷开心地乐了，他掏出100元钱给妈妈做营养费，这相当于爸爸两个月的工资。爸爸觉得爷孙俩这见面礼太重，推让着，但爷爷还是执意要给。爸爸请爷爷给我起个名字，爷爷想起了这一天的特殊，对爸爸说：“这一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就叫张纪，纪念的纪。”“文革”的时候很流行改名字，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实在是没有什么深邃的人生含义和远大抱负，自己想改，但我爸爸始终不同意，他说：“你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

困难来袭（1959—1961）

历史的车轮压过了1959—1961年，这三年又留下了怎样的时光印记呢？在中国文联的档案里，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张恨水。爷爷在用他衰老病弱之躯，抵抗着生活的剧变。

1959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中国文联的沈慧同志又来到我家，他们还在关心着爷爷，对他进行慰问和访谈。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约稿越来越少，爷爷逐渐闲了下来，兴之所至写写旧诗词。但这些旧诗词只不过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吟诵，已经没有发表价值了。他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他仍在从事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爷爷开始感觉到创作的绝望。

他对文联的沈慧发着牢骚：“现在的稿费太低，一千字只给四五元，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又怕发表后有什么问题，会受到批评，一天提心吊胆。劳动花的太多，报酬给的太少，索性不写算了。”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记者外传》也退还给了爷爷，不准备出版了，据说是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爷爷也

懒得再写。到了1959年，爷爷已经64岁，他第一次说出他已经疲倦了、不打算写了这类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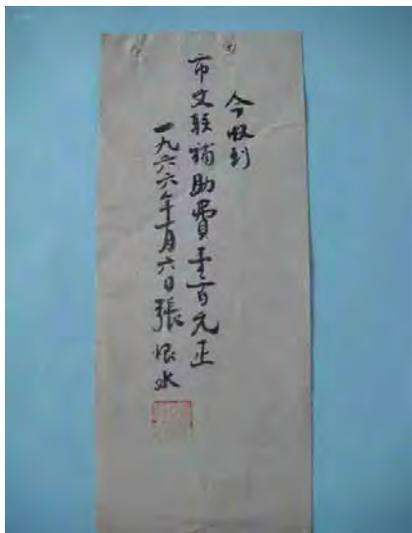
使一位作家的才华逐渐熄灭的原因，不是疾病，不是贫困，不是光阴，在我看来是不被认可、不被社会需要。爷爷一旦写不了稿子，生活来源就成了问题，一家又陷入了经济危机。

也就在这一年，爷爷收到了由习仲勋、齐燕铭签发，周恩来审拟的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爷爷成了一个有“单位”的人，每个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学习活动。中央文史馆是党和政府为团结和安排老年知识分子而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敬老崇文”，受聘者都是老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国家给一份工资，算是把他们养起来。

这纸聘书对爷爷的晚年生活是个保障，对我们家来说是及时雨。爷爷这棵大树在30年代鼎盛时期，曾养活过一家20几口人，包括把他的弟弟妹妹送进大学读书，他的朋友郝耕仁之女郝漾在抗战前夕就读我爷爷筹办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也吃住在我们家。如今昔日风光不再，在生活上、医疗上，他需要组织的关怀。

爷爷对文联沈慧同志说：“本来今年应该写《记者外传》的第二部，不能出版也就不再写了，天天在家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我的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症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爷爷感到了一种夕阳陨落的悲观和紧迫。他还想抓紧时间再出去走走。此前，他去了济南一趟，回来时为了省几个钱，没买卧铺，结果腿着了凉，一走路就疼。这年他特别想回安徽安庆老家一趟。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到了1961年，我家的情况更糟糕了。爷爷这样对沈慧说：“由于找不到保姆，把琐碎的家务也都承担起来了。有时候血压曾经高到24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粮食不够吃，没办法躺下来休息，还要每天劳



张恨水给文联打的收条

动。现在什么吃的都买不到，街道上分的一点白菜早已吃完了，吃稀饭找点咸菜都不容易，现在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到谁家都饿着肚子回去。这年头，日子不好过，我几十年来是习惯喝茶不吃早点的，现在连一两茶叶也买不

到。每月中央文史馆分给几盒一角钱左右一盒的烟，还没抽都碎了。听说杭州的供应情况好，饭馆可以吃到鱼肉之类，市面上也可以自由买卖。北京有个天桥自由市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这真是骇人听闻，我看没人吃得起，至少我是吃不起。我现在仍然要负担八个人的生活费，每天吃窝窝头都感到紧张。我很久都没有写什么作品了，写了也没有地方出版，何必费这个力气。现在我已经66岁，没有多少日子好活，每天重温旧书，《福尔摩斯侦探案》倒是很有趣味。每周到中央文史馆学习两次。文联组织文艺界到西山文艺之家学习毛选很好，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家里这一摊丢不下，没办法去学习。谢谢文联送给我的毛选四卷，不然，我真没地方去买。”

我每次去爷爷那里总是有吃有喝有压岁钱拿，读文联的旧档案颠覆了我童年的印象，爷爷艰苦的生活，让我几乎落泪。我妈妈当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幼儿园工作，能够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在高法也有一点特供，困难时期，她想法子为爷爷买一点好烟好茶，其他的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1年，我已经4岁，有了饿的记忆。记得喝棒子面粥，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舔干净我的饭碗，然后照照，很光亮，就对妈妈说：“妈，这个碗不用洗了。”遇上吃顿好的，我和姐姐在饭菜没上桌时就开始乱蹦，不停地叫嚷着：“大丰收了！大丰收了！”

1964年，文联沈慧同志最后一次来我家。当时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爷爷是这样对沈慧同志说的：“我去年大病后，又接着住了两次医院，情况都很严重。今年已经整70岁，实在是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地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当然，他们的条件比我好，另外，也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坚强。我属于旧文人，赶也赶不上了。这半年来，不断来人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

文人的黄昏（1962—1967）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这年的春节，吴范寰、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等一些爷爷的老同仁、老朋友，又拎着饭盒、每人带着一个拿手菜来我家小聚。万枚子先生集我爷爷小说书名撰写对联助兴：“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老人们戏谑玩笑，每次聚会都使爷爷非常地愉快。这一年，爷爷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卓文君传》由中国新闻社对海外发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老人的春天》，反映中央文史馆老人们的学、工作情况，其中有爷爷伏案写作的不少镜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暴风骤雨一般冲击着中国的各个角落。不知道爷爷是从哪里得来的消



伏案写作的张恨水（摄于1962年）



张恨水与全家合影，第二排右二为作者（摄于1966年）

息，有一天他对奶奶急切地说：“老舍死了！老舍死了！”老舍是爷爷多年的好友，创作路数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写北京人都能写得活灵活现。老舍曾经对我爷爷有过高度赞誉：“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他是个可爱的朋友。”（以上评价节录于老舍的《一点点认识》，此文发表在1944年5月16日的重庆《新民报》上）。老舍先生同样是爷爷的“可爱的朋友”，从1938年老舍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部主任、爷爷当选为理事后，两个人在重庆就是老朋友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对爷爷有过很多照顾。“文革”初始老舍投湖自尽对爷爷是个相当大的刺激，他病情开始恶化了，语言更加含混不清，无法控制的涎水使得他蓝色中山装前襟总是湿漉漉的。由于腿疾，他行动已经非常迟缓，坐在那里双腿还要盖上一个毛毯，才70岁刚过的人却衰老得让人看着心酸。慕名来看望他的文学晚辈唏嘘不已，这就是那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讲述人间故事卓然不群的张恨水吗？

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过革命化春节。这年的正月初七，爷爷早早起来，自己穿好衣服，预备去医院瞧病。在家人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失去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停止了呼吸。他脑溢血再次发作，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痛苦的呻吟，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安徽潜山老家有一句谚语：“今天穿的鞋子，不知道明天



张恨水与四子张伍、孙女张珂合影（摄于1967年）

能不能穿上。”爷爷走了，在人心惶惶的喧闹社会中他撒手人寰，别无长物！

贾俊学问我：“你爷爷可留下大量手稿？”我答：“很少见了，他写作是从不留意手稿的，每天三四千字，给报刊连载，要出版书就在报纸上剪。有时也用复写纸誊写，交给出版商。”他又问：“砖塔胡同的房子可还在？很多读者希望看看你爷爷的故居。”我说：“砖塔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我家所住的43号院子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我爷爷在北京还有过几个住处，能否保留一处，不得而知。”贾俊学脸上写满了遗憾。

爷爷初到北京时，曾写过一首《念奴娇》，其中一句“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尤得同乡成舍我赞赏，他全力举荐我爷爷步入北京新闻界，从此有了成名的张恨水。如果问爷爷给我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他的风，他的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爷爷写作《金粉世家》时是以报人的冷静眼光看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增加了一层“浮生如梦”的佛学色彩。他在序言中写道：“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爷爷自己验证了他的预言。

记寓居砖塔胡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

□ 郑再帅

砖塔胡同，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北街，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砖塔胡同因胡同东端有元代的“万松老人塔”得名。万松老人，俗姓蔡，法号“万松行秀”，山西运城人，是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师傅，圆寂后葬于此处。胡同肇始于元代，堪称北京胡同之根。有史料可证：元杂剧《张生煮海》中，张生的书童与龙女的丫鬟对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砖塔胡同86号院

近代，砖塔胡同因住过不少名人而享誉，如61号（后改为84号）曾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第三处住宅；43号（后改为95号）是著名作家张恨水在京的最后一处居所。

除了鲁迅、张恨水等知名作家居住过砖塔胡同外，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曾寓居于此则鲜为人知，如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就曾居住于86号院内。

86号院位于砖塔胡同中部偏西，原来的门牌号为甲60号，与鲁迅的故居61号相邻，两院门间相距不过20米。这里曾经有一个大德显灵宫，明永乐年间（1403—1424）建，明成化初年赐额“大德显灵宫”。宫内有明嘉靖三年（1524）《御制大德显灵宫碑》二通，现已迁移至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宫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有山门三间，木额上书“大德

显灵宫”，署“大清光绪七年太岁在重光大荒落月在围谷旦、赐进士身副都统銜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加一云骑尉锡 敬书”。硬山筒瓦箍头脊顶。玉皇殿五间，前出轩三间，前有月台，黑琉璃瓦绿剪边顶。东西配殿各五间，东为三清殿，西为关帝殿。东西配房各三间，东西寮房各五间。占地面积东西14丈，南北16丈，内有殿房48间，供奉泥像30尊，铜像7尊。

86号院分东院和西院两个主要部分，东院是由几个四合院组成。西院的北边是一座只有两个单元的灰色四层楼房和对面的一排平房，其中东单元和对面的一排平房属于高检察院宿舍，楼房的西单元归国务院办公厅。1966年，杨放之一家从中南海搬出后，迁居至砖塔胡同86号，在东院一处四合院内居住了三年。

杨放之与黄励

杨放之，1908年12月24日出生于河南济源。1921年夏，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四次英文科学习。1923年秋转入升格后的中州大学学习。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学习。中州大学派出了三名学生，杨放之是其中之一。1925年11月下旬，杨放之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日本，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杨放之

习。同船前往苏联学习的还有张闻天、王明、沈泽民、王稼祥、张琴秋等；张国焘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苏联参加会议。

同船前往苏联的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姑娘黄励。她比杨放之大3岁，湖南益阳人。黄励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靠着母亲和姐姐洗衣服兼做鞭炮维持生计，黄励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舅父资助下考入武昌的中华大学文科。1925年，在大学读书的黄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受命前往苏联学习。就在此次航程中，杨放之和黄励由相识而渐渐熟稔了。

1926年初，杨放之与张闻天等被编入中山大学翻译班。7月，由王稼祥介绍入党，随即担任党支部委员。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向忠发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向忠发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闻天负责领导学校的翻译工作，派杨放之担任向忠发的翻译。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杨放之转入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从此离开了中山大学。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中谈到对留苏学生的评价时，这样写道：“正如王稼祥在出国前那封信上所预言的，三四年以后，正是通过这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中国革命者，把‘莫斯科的精神’即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外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尽量地带入祖国’。”“历史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名字：除了王稼祥以外，还有邓小平、杨尚昆、乌兰夫、伍修权、傅钟、曾涌泉、吴亮平、杨放之、徐以新……”

从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杨放之、黄励由相知、相慕到爱情成熟，结为革命伴侣。邓中夏为保护杨放之夫妇，带他们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会后杨放之与黄励就留在书记处工作，负责《太平洋工人》周刊的中文版编辑工作。在莫斯科



杨放之与黄励

时，黄励曾怀有身孕，但考虑到孩子出生后会拖累革命事业，她决定打胎，杨放之虽然心有不忍，但还是尊重了黄励的选择。

1931年7月，杨放之、黄励夫妇结束了在苏联六年的生活，取道东北回国，于9月回到上海。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在海员中进行反日救国活动；黄励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在纺织女工中开展工作。

1932年4月，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国民党当局没有查到杨放之更多的情况，将他判刑两年半，送往苏州反省院囚禁。由于叛徒出卖，已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黄励于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女牢。她坚持信仰，矢志不渝，坚决不向敌人投降。在狱中，她思念已经被捕的杨放之。想到自己可能牺牲，她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缕，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

1933年7月5日，黄励高唱《国际歌》，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28岁。新中国成立后，黄励烈士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长留雨花台，供后人缅怀与瞻仰。

党的老报人

杨放之于1935年10月获释出狱，到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一边休养一边教书。身体康复后，即投入周扬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工作，担任中央文委（上海）委员。从此时起，杨放之经常使用“吴敏”这个名字发表文章，笔名逐渐为人所知。一年后，根据上级指示，化名吴敏的杨放之于1937年1月来到香港，任《珠江日报》主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武汉是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出版中心，各路文人先后在武汉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民意》《前卫》《抗战向导》等。吴敏于1937年10月北上来到南京，在周恩来领导下，会同潘梓年、徐迈进、华西园（华岗）等人筹办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有潘梓年、章汉夫、吴敏（杨放之）、华岗（华西园）、楼适夷、陆诒等。华岗担任总编辑，潘梓年为总经理，章汉夫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部其他人员的分工为：吴敏负责撰写评论，石西民编辑国内新闻，楼适夷编辑《团结》副刊。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从此，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新华日报》转移到号称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出版了八年之久，毛泽东同志曾赞扬《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1939年杨放之任重庆《新华日报》编委、编委常委。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任编委、副总编辑、新闻编辑部部长。

1945年，杨放之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由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1946年10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河北武安县河西村稳定下来，晋冀鲁豫中央局任命原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吴敏前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48年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

北解放区，成立新的华北中央局，刘少奇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原两大区党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合并，使用原《人民日报》报名，成为华北局机关报。进入1949年，《人民日报》已成为中共党报中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194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于8月1日起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周总理亲点之将才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副总理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杨放之在陈云手下工作，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副局长，主要负责苏联专家工作。

1950年国庆节，周恩来总理出面宴请苏联专家，在陪客名单上特意添加了五人，分别是陈云、薄一波（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财委副主任）、宋劭文（时任中财委计划局局长）、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杨放之。同年11月，伍修权、杨放之、赖祖烈、武竞天、张锡侑商拟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报送周总理，经总理批准予以颁发实行，并指定他们五人成立一个小组，伍修权与杨放之分别任正副组长，专门组织和检查各项具体办法之执行。1951年2月，为了加强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管理业务，政务院批准中财委成立专家工作联络室，杨放之兼任该室主任。1953年6月13日，周总理向毛主席及中央各负责同志写报告，“为了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并办理专家聘请、分配，招待和进行专家工作的联络和检查，提议在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组”，同时设“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作为工作组的办事机构，由政务院直辖。杨放之被任命为“专家工作组”成员之一，并兼“专家工作办公室”主任。1954年4月，杨放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此时，“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与“政务院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合并，组建成“政务院专家工作局”（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时，随之改称“国务院专家工作局”），1956年5月，改称“国务院外国专家

局”，杨放之担任局长。至1964年10月，杨放之除了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杨放之的主要任务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统一负责全国引智战线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出现了新中国引进国外智力的第一个高潮。在苏联东欧国家援助和专家的帮助下，我国取得了抗美援朝和粉碎台湾当局骚扰、反攻大陆的胜利，同时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并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引进了许多包括原子弹、导弹技术在内的

先进、尖端技术，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许多人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领导人，中央部门、省市的负责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各学科、专业的带头人。

1980年12月至1982年9月，杨放之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任外专局顾问。

杨放之先后任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会常委等。在1986年至1989年，杨放之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他在任内为恢复和重建欧美同学会，为解决欧美同学会会所、编制、经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拓展对外联系渠道，建立同海外留学人员、著名的华人科学家和知名人士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2003年4月28日杨放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杨放之在延安工作期间，又结识了政治经济学教育干事杨博然，喜结连理。杨博然，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40年代初，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校学习。



本文作者郑再帅（左一）与杨放之三女儿杨珍教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影

抗战胜利后，随军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工作。婚后，杨放之与杨博然育有四个女儿。三女儿杨珍生于1955年，现为著名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著述颇丰，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我有缘识荆，时承杨老师晤教，受赐良多。据她告知，1969年，其全家下放至国务院直属口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几年后，全家从干校返回，迁至灵境胡同居住，后乔迁东城菊儿胡同新居。

今年适逢杨放之诞辰110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可亲可敬的“苗大爷”

——忆漫画大家苗地先生

□ 徐进

2017年10月16日上午，电话传来苗地先生溘然仙逝的噩耗，真如晴天霹雳使我惊愕不已，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苗地——这位中国漫画界的弄潮儿91年的人生道路，至此画上戛然而止的句号，走得是如此仓促。

曾在西城区华仁路31号居住多年的苗地先生，1926年生于山西河曲，先后就读于华北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即在人民日报担任美术编辑达40余年。其间创作了大量漫画、风俗画、插画、速写等美术作品。苗地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受到读者的喜爱并赢得我国杰出漫画家的地位。

读者和同行为何喜欢苗地的画？正如评论家所说的，他的作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幽默感，采用夸张变形、象征比喻诸多手法，从不同层次和侧面鞭挞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黑暗、腐败、愚昧、落后；褒扬科学、法制、进步、高尚。苗地这些“接地气”的作品，能够化丑为美，拨动人们心弦。因此，画作就有了脉搏，有了情感，有了灵魂。也可以说，既养眼又养心。

苗地先生的代表作有：《解放前的吉祥戏院》《把知心的话讲给书记听》《爷爷和孙子系列》《随从》《摄影趣话》《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访日见闻》《小侯外传系列》等。水墨漫画《小放牛》《放下布袋何等自在》《钟馗》《牧归》《惠安渔女》《天山红花》等等传世之作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时光冉冉，沧海桑田”。回想起与苗地先生认识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虽然没有“追星族”之说，但人们对心仪的漫画家景仰确是由衷的。最初印象苗地老师话不多，对青年漫画爱好者的来访是热情

真挚的，对不成熟的画稿直言不讳有啥说啥。有的放矢地点拨和作画先做人的箴言，让我们终生受益。在求教中，我看到他帮扶、辅导的青年作者一拨又一拨，可算是“桃李满天下”！

我不想拉旗作皮，谬托知己，但实事求是地讲，没有苗地等前辈的教诲和提携，我们这些曾经的爱慕者就不可能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至今在我留存的画稿上仍有苗老师修改的笔痕。望着熟悉的线条，我默默地想：自己每一点一滴成绩中都包含了漫画前辈的心血和汗水，可不能忘记啊！

抚今思昔，往事如昨。苗地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每当遇到难题或急活时，首先会想到苗地、王复羊、孙以增等漫画家，他们没有“架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在赶稿如“救火”的案头，“急就章”成了家常便饭。苗地经常主动给“工人的画”出主意、供稿、担任没有评委费的漫画评委，这种无私和慷慨，真是令人钦佩。老漫画家们不但是工人日报的朋友，还成了客座编辑，他们给全国职工读者“雪中送炭”，自己也收获着快乐。

苗地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凡是与漫画有关的事，他都义不容辞地担当在身。对“工人的画”编辑部和漫画同仁组织的义卖、采访、辅导活动从不计名利，不讲条件，亲力而为，以身示范。我们约请苗地



漫画家苗地先生

等名家先后去过山东胜利油田、河北邯郸城建集团、山西客运车辆段、吉化集团、首都航天机械公司、北京汽车制造厂等基层单位，为一线职工送去作品，传授创作经验。

苗地先生离休后多画水墨漫画小品。他说，通过画水墨漫画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为画出中国气派的漫画大有裨益。他在探索实践中，利用自己造型能力强的优势，运用优美的勾线，畅快的敷色，结合构图跳跃多变的逆向思维方式，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水墨漫画。苗地先生不保守，他有了新作品、新技法都摆到桌面，让同行“掌眼”和借鉴。他经常在画案旁，结合自己的艺术经历鼓励年轻美术编辑拓宽思路，书要多读，博学详视，遍采广询，这样才能使版面出“彩”。在1998年初，方成、苗地二老不惜屈尊，“带”着我举办“三人水墨漫画展”，让我搭上了通往艺术殿堂的快速列车。

苗地的画好人缘也好。心地善良、古道热肠、谦虚好学、与时俱进的心境使之永葆艺术青春，这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被人们呢称“苗大爷”。平时衣食简朴，不近烟酒的“苗大爷”却十分喜欢在同行或年轻人当中“凑热闹”，谈天说地。他从大家的觥筹交错无拘无束的聊天中，体味生活的真味道，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愁。苗地会说“蔫”笑话，还用山西方言讲民俗、夸老乡，幽默又风趣。故此，“苗大爷”的故事也随之不翼而飞了。例如“擦自行车”，说的是：某日苗老见楼下女儿自行车甚脏，端来清水抹布擦洗。此时，忽听到一小女孩说道：“苗爷爷真好，您



苗地作品《小放牛》

在学雷锋呀！”原来苗大爷擦错车了……

多年来，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论人时，切勿盲目相信什么“大师”“专家”，我们上过当。某些道貌岸然、侃侃而谈的“大师”“专家”们一到论真学问的关键时候，就会露出灵魂上的霉斑，现出骨子里的奴才相。说俗点，他们就是一群瞎话篓子！苗地除了聪明、睿智还是个老实人，对人对艺术都老实。谁能相信市侩性格、投机取巧的人能成为艺术家？靠自吹或炒作岂能替代创作？苗地一生低调，不事张扬。他在现如今的世态纷扰中保持淡定，从容执着地修炼漫画之“道”。直至耄耋之年仍然拒绝丢弃传统；拒绝记忆断层，坚持弘扬国粹；坚持笔耕不辍。这是多么崇高的人生境界啊！

说不尽的苗地，他是德艺双馨、著作等身的漫画大家，更是我们亦师亦友的老大哥——虽然并非相见恨晚，却是相别恨早矣！“沧海月明珠有泪”，愿苗地老师的英魂，永远与沧海、明月拥抱在一起。

画舫斋的记忆

□ 王震亚

画舫斋位于北海公园东岸，是一处隐逸于山石林木之中、环方形水池而建的独立院落。正殿坐北朝南，匾额上题有乾隆皇帝亲笔的“画舫斋”三个字，其灵感不知是否得自欧阳修的《画舫斋记》。东西有“镜香”“观妙”两个配殿，遥相对应。而南面的前殿，则名“春雨林塘”。相互间，有朱漆回廊连通，与水景相映成趣，平添了一份雅致。

作为清代皇家的一个小型行宫，光绪皇帝曾在此居住，慈禧太后也常来这里游宴。尤其是乾隆，多次在画舫斋召见书画名家切磋技艺。也许是有此渊源的关系，民国时期这里就开始成为对民众开放的、举办艺术展览和活动的场所，而且，这一传统还延续到了解放以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海公园是我每年都要造访几次的地方。除了冬天溜冰、夏日划船外，主要是去画舫斋看展览。

那些年，在画舫斋举办的画展很多。比如1958年秦仲文、胡佩衡、吴镜汀、周元亮等人的联展；1959年于非闇的遗作展，1960年周怀民、卫天霖的个人展等。其中，于非闇以传统工笔花鸟画名世，卫天霖以精研西方油画见长。巧合的是，两人的画风，竟有相似之处：色彩绚丽，又不失凝重、醇厚。至于秦仲文诸先生，均以山水画名世；而周怀民则有“周芦塘”“周葡萄”的别称，所画葡萄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外国领导人。

不过，最想提及的是1962年的马晋画展。作为北京画院画师马晋先生新收的一名弟子，虽然每个周日都能登堂入室亲聆老师的教诲，但不可能有机会像在画展上那样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精品。

我发现，老师在成为画马名家之前，很是下了一番临摹功夫的。比如，临仇英的《江南春图》、赵子昂一门三代的《人马图》、文徵明的《九歌图》、新



画舫斋

罗山人的《苏武牧羊图》、郎世宁的《羚羊图》等，幅幅作品都能做到惟妙惟肖。而且，并非只是画马，乃是山水、人物、走兽都包括，可谓不拘一格取法百家。

画展上还有一些是老师画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生作品，如《卧犬》等，让我意识到：临摹固然重要，写生亦不可或缺。正是有了临摹与写生并重的厚实基础，源于郎世宁的工笔写实画法才在老师的手里有了新的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借用行家们的评价就是：“工而不拘，细而不碎”，与郎世宁的“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拉开了距离。那些完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八骏图》《骏马图》《秋菊梧桐鸟》《孔雀》等精心之作，极富质感和体感；采用小写意画法的《万马奔腾》《鹿》（指画）等，更是鲜活、灵动。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长长的展柜里摆放的《临郎世宁百骏图》曾轰动一时，引来无数的观赏者。画卷纵68.5厘米，横566.5厘米，色彩秾丽，布局复杂；山水、草木、人物，尤其是马匹，无一笔不精细。比例精准，明暗有度，尽显西画特色；讲究勾线、辅以皴染，又有传统中国画的意味。这是老师于一年前特意为此次画展摹绘的。其实，早在1923年，老师就临



马晋画马

摹过《百骏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930年，又二次临摹（现藏于北京荣宝斋）。所以我所看到的是第三次的临摹之作。虽说是临摹，但此时他已62岁，正处于绘画艺术集大成的年龄，故而融入了老师毕生的修为，无异于再创作。而不惜耗时费力，三临《百骏图》，亦体现老师在研习画艺上的精益求精与执著。据前几年报载，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2年秋拍会上，此画拍出了1092.5万元的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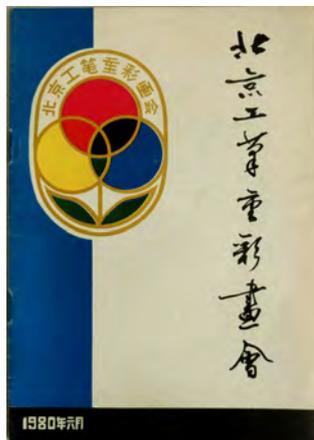
1971年2月底，时值“文革”中期的北海公园突然关闭，画舫斋自难幸免。至于关闭的原因，据说是出于备战的考虑，与代号“五一九工程”的建设有关，不知确否。

1978年3月1日起，北海公园恢复对公众的开放。随之，画舫斋作为艺术展馆的功能也重新得到延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此举办的展览已达两位数。其中就包括1979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北京画院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筹委会联合举办的“迎春画展”。

同年6月，画舫斋又推出了“北京工笔重彩画展”。正是这个画展，直接催生了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于当年9月的成立。由此，带动不少省市的工笔画家也开始组建专业性的艺术社团。

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工笔重彩画的优秀传统为宗旨，由刘凌沧任名誉会长，潘絮兹任会长，黄均、田

世光、俞致贞、刘继卣、任率英、陆鸿年任副会长的画会，成立伊始便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前辈大师于当年底至第二年初，每周一次的讲座与观摩。包括黄均讲《如何运用传统工笔重彩技法，为今天服务》、田世光讲《花鸟画的出新问题》、潘絮兹讲《色彩的运用》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简介

等。而这些活动，均是安排在画舫斋的东北角，一个名曰“古柯庭”的小院落里进行的。

该院落虽小，却大有来头。因为院中有棵传闻已近千年的老槐树，深得乾隆帝的喜爱。不仅于树侧点缀太湖石，兴建“古柯庭”，还多次以古槐为题做诗。其中一首云：“庭宇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寻嘉树传，当赋角弓歌。阅岁三百久，成荫数亩多。底须向王集，工拙较如何。”通常，这个小院落不对外开放。但在那两年里，画舫斋对画会格外宽容，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彼时，我作为77级中文系大学生正在校园里读书，学业的紧张自不待言。但是，出于对绘画的热爱，我还是在北京画院徐聪



古柯庭

佑老师的关照下聆听了这些讲座。而且，还在她的激励下，把因上山下乡而废弃的画笔重拾了起来。构思、起稿、落墨、着色，把每个周日以及没有课的周二、周五的下午都用来作画。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80年的4月底完成了一幅四尺整纸的画作。原本想以杜甫名句“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作为画题，却被画会的一位领导在观摩草稿的评议时劝止。理由是：“横行”二字，容易让人想起“四人帮”（当时，“横行”一词常与“四人帮”连用），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改题“六骏图”。

开展那天，我拿着请柬从画舫斋西北角的垂花门进入，内心深处依然惴惴不安。因为之前的一次画会活动时，会长曾说过，由于展厅容量有限，不能保证所有会员送交的画作都能展出。而我此时尚未入会，所以更担心自己的画作会率先被淘汰。

展厅里人头攒动，观众还真不少。仗着个儿高，我的目光迅速扫过观众的头顶，环视四壁。也许，是心有灵犀的关系，第一眼就看到了正殿东墙悬挂的《六骏图》上部的柳枝。趋前细看，发现我的这幅画竟然悬挂在会长潘絮滋的画作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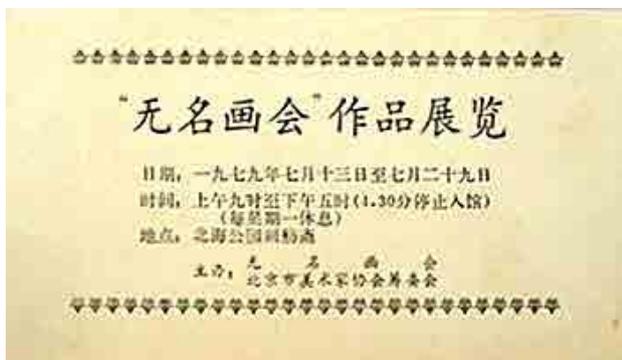
这是工笔重彩画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年展，共展出110幅作品，在美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后，几乎每年都办展，为中国工笔画艺术的传承、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影响力辐射到了海内外的许多地区。

也许，是时代使然。新时期之初的画舫斋还扮演过更为引人瞩目的角色。

那时，突破种种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春潮般涌动。诗歌领域有自办刊物《今天》与朦胧诗；小说领域有伤痕反思作品与意识流；绘画领域则有无名画会、星星画会的异军突起。其共同的特征是：政治批判意识、文化启蒙主义和艺术探索精神的彰显。

其中，无名画会与星星画会的展览亦是在画舫斋举办的。

关于无名画会，之前我并不知晓。1979年7月（7日—12日为内部展，13日—29日为公开展）它在画舫斋的画展，才让我对这个画会有了一点儿了解。原来，画会的主要成员赵文量、杨雨澍、石振宇、张达安等人早在60年代就很活跃了。他们通过户外、郊野写生来感受自然、获取灵感，不受既有理论与画风、技法的束缚，强调自由、独立的意识，着意于艺术个性的自我表现。所以，与当年大一统的时代氛围、政



无名画会作品展览请柬

治气息不相吻合，相互间只能在自己狭小的家中悄悄地观摩、切磋。得益于“文革”的最终结束，以及时任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和老画家刘海粟、王森然等人的支持，他们才临时以“无名画会”的名义申请，获得在画舫斋首展的成功，每日的平均参观人数达到两三千人。1981年7月，他们又在画舫斋举办了第二届“无名画会”作品展，再获成功。

与之比较，星星美展的面世，似乎有更多的波折。

记得是1979年的9月27日，我去中国美术馆参观《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尚未走到门口，就发现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上，高高低低地挂满了国画、油画、版画与雕塑作品，吸引了无数驻足观看的路人。多少年过去了，许多记忆都被岁月的长河所冲淡。但是，他们的口号“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与一件题为《沉默》（王克平）的木雕作品却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只眼被封住，张开的嘴巴被木头堵住的头像。显然，这种富含政治寓意的作品是过于敏感了。两天之后，马德升、王克平、黄锐、曲磊磊、薄云、阿城、李爽、严力、杨益平等23名青年业余画家自发举办的街头展览被取消。

毕竟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经过抗争与各方面的斡旋，夭折的星星画展于两个月后获得了正式展出的权利。而接纳它的，还是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一时社会轰动，盛况空前。从11月23日起到12月2日止的10天里，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前来观展。

转过年去，星星画会在“中国美协北京分会”注册后宣告成立。随之，于1980年8月20日至9月7日举办了第二次美展。而展出的地点，改为中国美术馆，观众人数高达十五六万。

尽管，两个画会的作品都正式展出了，但相关的争议并未结束。甚至，在一定的政治气候下，还会升级。但是，从当初只能在家里秘密观摩、街头展出还被取消，到堂而皇之地进入北京美协的活动场所画舫斋与国家级的中国美术馆内展出，无论是过程的曲折还是画作内容与形式的前卫化，都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与节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画舫斋又一次停止开放。而且，这一停止就近20年。那些年里，我每次去北海公园，仍会习惯性地往画舫斋走去，内心总有一种侥幸的期盼。待到近前，望见垂花门依旧紧闭，不禁又怅然若失。

失望之余，我会绕过画舫斋，沿幽僻小径南去濠濮间。

这是北海公园中紧邻画舫斋的又一著名的园中之园。一座青石的小小牌楼，迎面而立，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对联。过了牌楼，便是七曲石桥，静卧于一湾清冽的碧水之上。桥南的水榭，雕梁画栋，



濠濮间

黑底的匾额上书“濠濮间”三个金色的大字。水榭后还有依山而建的回廊，消隐在林木间。

这个园子，格局不大，却精巧、清静。无论是走曲桥还是回廊，都可移步换形，有美的发现。而三面环水的水榭，正是稍事歇脚的好去处。

依旧是不甘心，频频北望。但林木土坡挡住了投向画舫斋的视线；一如紧闭的大门让人无法知晓此刻的园内是荒芜了，还是派作其它的用场。

回头仰视匾额，不免遐想这“濠”与“濮”的蕴涵。两典都出自《庄子》。“濠”乃水名，庄子与惠子曾同游于濠梁之上，辩诘：是否能知“鱼之乐”。“濮”亦水名，庄子曾持鱼竿垂钓于濮水，拒绝了楚王要他出仕的邀请。显然，二者均体现了古人寄情于物外的超然自得与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

如此想来，还需耿耿于画舫斋的开与不开吗？

自1981年始，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的各种展览已经另找场地。从北京办到外地（香港、内蒙、云南、广西、湖南、吉林、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从中国办到美国、加拿大。而无名画会与星星画会的成员们也于80年代初因各种原因流散各地，或出国深造，有各自很好的发展，再没有以这两个画会的名义搞过展览。

不过，曾经的画舫斋岂能轻易被淡忘呢？所以，2002年8月20日，当我闻讯画舫斋在关闭了近20年之后再次重新正式开放时，内心仍然是很激动的。而重新开放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20世纪初的北京”图片展。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图片是马可·波罗故乡的马达罗先生所收藏的。2005年9月29日至10月7日，享誉海内外，兼擅油画、水墨画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尔纯的画展亦在画舫斋举办。

当然，如今的首都北京，可以举办画展的场馆太多了。除了中国美术馆外，还有中央美院展厅、炎黄艺术馆、国博、首博等，规模都不小。因此，深藏在北海公园里的画舫斋似乎渐渐地不再承担办展的任务了。或许，也有保护古建筑的考虑吧。但它，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起到的作用，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必将载入史册。

北京内城现存的下马碑

□ 史可非

下马碑是中国及东亚地区古建筑中一种常见的石刻造型艺术，在明、清两朝《实录》与档案中记作“下马牌”，清代一些官书中也记作“下马牌石”或“下马石碑”，满文名称（拉丁转写）有二：“ebubun camhari”（让人下来所用的牌子，也指下马石）、“ebubure camhari”（使人下来的牌子）。下马牌选材分木、石两种，其中石碑也习惯称为下马碑，但严格意义应称为“碑碣式下马石碑”，以区别于下马石碑坊。我国常见的下马碑多用汉白玉、花岗岩、大理石、青砂石制成，采用笏板碑形式，上无碑额、下无龟趺，风格简洁。有些在碑身前后加装方形、抱鼓、滚墩形碑座，有些将碑座嵌在碑身四角以加固与装饰，民间所称“有碑无驮”之说即源于此。北京内城地区至今仍保存着一些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下马碑，但因长期以来所受关注不高、相关研究极少，对其名称、形制特别是有关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表述也常见混淆及谬误，故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记载试撰此文，以期抛砖引玉，使该类文物引起更多的关注，受到更好的保护。

下马碑的由来、用途与传衍

下马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礼仪体系的象征之一，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五伦观念。敕造与官造的下马碑只用于与“神”（自然或宗教崇拜对象）、“圣”（古代贤哲、历代帝王）相关的建筑物周围。如：祭祀祠庙、皇家宫殿、帝王墓陵等建筑群正门之外或步道两侧。下马碑的设立与使用均属封建礼制范畴，碑文虽多刻“下马”二字，但施令范围实际包括使用畜力、人力在内的一切交通工具。来往行人在见到此类碑刻时必须下马、出轿、离车后方能步入建筑物内或徒步通过后方可重新上马、入轿、进车离去，以此体现建筑物所有者或供奉者自身的威严及

表示恭敬之意。下马碑是一种谕令碑，作为封建时代国家法令的一种物化形式，碑文主旨等同于最高统治者的口谕命令，违背者将会受到惩戒。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下马碑，为今天山东省曲阜市孔庙门前之物。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诏令于孔子庙前设立刻文“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驻骄下马”的下马碑，明永乐十五年（1417）重立刻文“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石碑并保存至今。

需要一提的是，在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地区与国家也有不少

下马碑保留至今。如：中国台湾台南市孔庙、朝鲜开城市善竹桥、韩国首尔市李朝宗庙与东关王庙、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古琉球国）崇元寺与京都府八幡市石清水八幡宫、越南河内市文庙国子监以及蒙古国巴伦布兰县庆宁寺等所用之物。其中，蒙古国、中国台湾各地所见下马碑多为清代旧物，其形制、风格与中国



曲阜孔庙下马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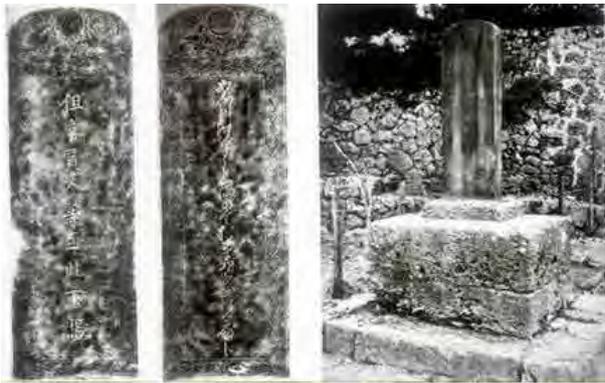
台南孔庙下马碑及碑拓



朝鲜开城善竹桥下马碑（左一）



韩国首尔李朝宗庙下马碑



琉球（今日本冲绳）崇元寺下马碑（1527年立）
（左一为碑阳汉文、左二为碑阴琉球文）

北京内城现存下马碑

北京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六十余年的建都史。辽、金、元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使用过不少下马碑。明朝还曾在东、西华门护城河平桥外口，桥身正中各建三门式“下马门”一座。清承明制，作

内地所见下马碑类似。而日本、韩国所见下马碑体量较小，多立于名寺、神社、宗庙等场所，用汉文写成，个别会在汉文旁边或碑阴处配加朝鲜语谚文、日语假名的释文，但都只是起到一种辅助说明的性质，与我国清代多文合璧下马碑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封建等级礼制森严。清朝统治者要求统治阶层（旗人）用满语、满文保持民族意识，又自认本朝“以武定天下”，希望以精骑善射的民族长技维护长治久安，故将“国语骑



明十三陵大宫门下马碑、拓片

射”定为立国强族之本，对宗室贵族、文武官员特别是武职骑马一事反复重申并做出明确规定：“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准其坐轿。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职大臣、俱不准坐轿。”这些客观因素也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重要标志的下马碑推上了一段“繁盛”期。清朝早在入关之前的后金时期已开始使用下马碑，但制度尚不完备、执行亦不严格。在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清朝统治者在皇城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外，宫城的午门（阙左门、阙右门各一）、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外，天安门至正阳门之间的大清门外（同时设鹿角、挡木、石栏杆），东、西长安街牌楼两侧，大高玄殿外，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景德街东、西牌楼两侧，安定门内孔庙成贤街东、西牌楼两侧等多地设立下马碑。此外，对于王府、妃嫔园寝等处设立下马桩，对贤良祠等一些场所还会由礼部奏请经议准后设立功能类似的“下马柱”“下马红柱”作为提示标志。随着时代的变迁，目前北京地区除明十三陵还保存明代下马碑实物以外，通常所见下马碑、下马石、拴马桩等基本为清代旧物。经实地调查，目前北京内城地区仍完好保存着10座清代下马碑。其中，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外2座、西华门外2座、午门外阙左门、阙右门各1座、孔庙国子监博物馆门外2座、历代帝王庙博物馆门外2座。上述下马碑均为清代敕造，选料考究、书丹遒劲、雕工精

湛，堪称同类中的精品。



阙左门（左）、阙右门（右）下马碑

故宫下马碑

故宫现存下马碑共6座，但形制、特点不尽相同。

午门前阙左门、阙右门外现存2座下马碑，碑通高约4米、宽约1米，厚约0.4米，碑首上部方形镂空无雕饰，加尖山式悬山筒瓦屋面顶，碑身下部雕如意云头纹再接抱鼓形碑座。碑阳与碑阴使用汉（楷体）、满、蒙、藏、托忒、“回”文镌刻“官员人等到此下马”文义的词句。顺治八年（1651），清廷对王公入宫礼制做出明确规定：“和硕亲王于午门前下马，多罗郡王于午门角楼下马，多罗贝勒以下俱于阙门下马牌处下马。”



西华门（左）、东华门（右）下马碑

东华门、西华门外的4座下马碑，形制完全相同。碑通高约4米、宽约1米，厚约0.4米，碑首上部方形镂空无雕饰，碑身下部雕刻如意云头纹再接抱鼓形碑座。东华门下马碑修复痕迹明显，但字迹十分清晰。西华门外两碑碑首上加尖山式悬山筒瓦屋面顶，但风化相对严重，字迹已较模糊。东华门、西华门下马碑的碑阳与碑阴分别使用汉（篆体）、满、蒙、藏、托忒、“回”各三种文字镌刻“至此下马”文义的词句，其中满、蒙、汉文一面的刻字巨大，颇显古朴、庄重。



1900年历代帝王庙门前，来往行人要从影壁后绕行通过

历代帝王庙、孔庙下马碑

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地处阜成门内鸣玉坊南端，清代属正红旗满洲四参领十二佐领地界。实际明朝在历代帝王庙建成后已设立下马碑，但之后已被清代下马碑取代。上世纪50年代，为了疏导首都道路交通，市政部门拆除了景德街牌楼，下马碑也在十年浩劫中被砸成碎块填土掩埋，在碑址上围砌砖池、栽种松树。1999年10月，西城区文物管理部门在对历代帝王庙文物建筑进行修缮时将残损碑块掘出，经过修复后重立于庙门两侧，使之重现于世。历代帝王庙现存下马碑高4.12米，宽1.06米，厚0.42米，碑身上部雕刻双层套环如意云头纹，碑身下部雕刻汉纹图案再接抱鼓形碑座。两碑分别在碑阳与碑阴用汉、满、蒙、“回”、藏、托忒六种文字刻写“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文义词句。



历代帝王庙下马碑碑身上、下部雕刻纹饰



孔庙东侧下马碑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元末荒废，明永乐九年（1411）重建，是元、明、清皇帝亲祭孔子之所，也是全国仅次于曲阜孔庙的第二大孔庙，明、清两代多次兴修，尤以清乾隆时期为最，现存下马碑当设立于

这一时期。孔庙下马碑位于成贤街牌楼东西两侧路北，碑身上部雕刻如意云头纹，碑身下部雕刻夔龙纹饰，碑刻体量、文字风格与历代帝王庙下马碑相同，



大高玄殿下马碑拓片

保存十分完好。

需要在此一提的是，根据文献记载，明、清统治者在皇家道场的大高玄殿外也曾设立下马碑。大高玄殿位于神武门西北，建于明嘉靖时期。明朝曾在大高玄殿象一阁宫门左右设立镌刻“宫眷人等至此下车马”词句的石碑各一座。清代下马碑的具体设立时间尚未见详细记

载，推测在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一年（1746）两次修缮期间的可能性较大。清末民国时期，大高玄殿屡遭破坏，殿外的习礼亭与牌楼也被陆续拆除，下马碑也应在此期间被移走或掩埋。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碑拓文献，大高玄殿下马碑碑阳与碑阴分别用汉（楷体）、满、蒙、藏、托忒、“回”六种文字刻写“王以下官民人等以上至此下车马”文义词句。

清代下马碑的文字、特点与内涵

不难看出，清代在下马碑的选材与工艺上基本沿袭前代成法，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即在于多种文字“合璧”这一碑刻形式。中国人曾将“日月同升”这一视觉感知认为是祥瑞之兆称之“合璧”，后世又引申为会集精华、对比参照之意。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由满族贵族为核心，联合蒙古、汉族上层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为示各族平等之意，有清一代在刻书、制碑、铸币等方面采用多文合璧这一形式极其普遍，其中又以满、蒙、汉与满、汉文合璧最为常见，虽在形式上有文字相互对照

之意，但绝非简单罗列而具有实际的政治深意，与此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各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交融及认同。以历代下马碑为例，尽管六种文字文义相同，但因文字所对应的语言分属不同类型，不仅在语气、用词、语感上都存在一些差异，所涉及的民族、语言、历史、文化内涵亦十分丰富。如：

满文（拉丁转写）为：

geren hafan irgen uba de morin ci ebu

众官民此于马从下

句末“ebu”为动词“ebumbi”（下来）的直接命令式形式，语气严厉，汉语可直译为：“众官民在此下马！”蒙古、托忒、“回”文在语法结构（谓动词均在句末）、语气风格等均与满文类似。

藏文（拉丁转写）为：

blon-po-mang-ma-rnams-dang-vbads-dmangs-thams-cad-vdi-la-rta-las-bob-zhig

大臣众多无多与庶民一切到此马从下

其中，句末的“bob”系表示时态的命令式，“zhig”是表示规劝、命令的介词，汉语可直译为：“众大臣与所有黎民到此下马！”

文字的具体排列方式为：庙门左侧下马碑碑阳满文居中，其左为蒙文，右为汉文；碑阴托忒文居中，其左为“回”文，右为藏文。庙门右侧下马碑碑阳托



历代帝王庙下马碑上的六种文字

左图从左至右：汉、满、蒙文

右图从左至右：藏、托忒、察合台文

忒文居中，其左为“回”文，右为藏文；碑阴满文居中，其左为蒙古文，右为汉文。如此立碑的目的在于使两碑上的六种文字四面明示，以体现各族平等之意。碑上汉文用繁体楷书竖排刻写，满文、蒙古文与托忒文按书写习惯楷体纵排刻写，藏文与“回”文按传统书写习惯横写，每行1至3字，当空间不足时按音节断音另行刻写。藏文字序由左向右，“回”文字序由右向左。在以上六种文字中，汉、“回”两种文字不使用标点。满、蒙、托忒文使用句号标点（传统称为“双启壳”）“»”（尖头朝下），藏文使用句号标点（“分句线”）“|”。以上六种文字按照各自传统书写习惯可总分为竖写与横写两大类，除汉文为表意文字之外其余五种均为拼音文字，分别由不同宗教信仰、代表三种人类文明形态的民族创制。而按照现代语言学划分，上述六种文字所对应的五种语言又分属汉藏（Sino-Tibetan）、阿尔泰（Altai）两大语系。

汉语与藏语属于汉藏语系，在形态结构上为孤立语类型，词汇由声调区分语义。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构成汉藏语系单独的一个语支。汉文是汉语书面语的书写形式，通常认为经历了陶文、甲骨文与殷商金石文、篆书、隶书、楷书（包括草书与行书两种变体），其中楷书又称“正书”。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也称喜马拉雅语支），使用人口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之间差别主要表在语音上，其次是词汇和语法。其中，卫藏方言与安多方言之间差别最大，基本不能互通。康方言介于二者之间，但比较接近卫藏方言。藏文是藏语书面语的书写形式，源于古印度文字系统，是一种古老的音素拼音文字。明、清时期也称“番文”“西番文”等。



1953年历代帝王庙门前石桥及下马碑

满、蒙古、托忒、“回”四种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下的三个语族，在形态结构上为黏着语类型，词汇无声调而有重音，通过大量助词实现语法功能。四种语言语法结构相似，谓语均在宾语之后，动词变化丰富。满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满文是满语书面语（以明代建州女真语语音为基础）的书写形式。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下令参照蒙古文字母结合女真语音特点创制“老满文”。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下令对“老满文”加以改进与完善，创制了沿用至今的“新满文”。满语也称“清语”，满文也称“清字”“清文”“国书”，存世文物、文献十分丰富。满文与汉文同为清朝法定通行文字但地位更受优崇，故与其它文字合璧出现时一般居中。

蒙古语属于蒙古语族，蒙古文是蒙古语书面语的书写形式，13世纪仿照回鹘文字母创制而成，故又称回鹘式蒙古文，之后逐渐发展成为通行于蒙古大部分地区并在我国（蒙古国与俄罗斯联邦均已改用俄语基里尔字母拼写蒙古语）沿用至今的“胡都木蒙文”。托忒语是西部蒙古语卫拉特（清代称厄鲁特）方言，



上世纪60年代左右从历代帝王庙门前通过的小学生

托忒文即17世纪中期在传统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改制的、能够比较准确表现这种方言语音特点的一种文字。

“回”是中国古代对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一种统称。元代是穆斯林民族东来及中国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元朝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称为“回回”，曾于延祐元年（1314）在大都设回回国子监。“回人”“回子”是明、清时期对穆斯林民族的一种泛称。满语表示回人的“hoise”一词可能是早期借自汉语“回子”一词而成为固有词的，也可能是由“回”（hoi）与“众人”（uruse）两个满语词接合而成，作为满族对中国西北地区“回部之人”的通称。清代汉文又具体分为指代西北维吾尔等穆斯林民族的“缠回”（头裹白布）及内地杂居回民的“汉回”（说汉语的穆斯林）两种表述。此外，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回回语”还曾泛指回鹘语、高昌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明、清时代所称的“回语”实际为察合台语，是今天维吾尔语与乌兹别克语的原语，也是14至20世纪20年代维吾尔人与中亚地区操突厥语各民族共同使用过的一种书面语，属于突厥语族，察合台

文即这种语言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书写形式，也称“回文”“回子文”“回回文”，现代维吾尔文是察合台文的延续。满、蒙古与托忒文均脱胎于竖写的、已消亡的古回鹘文，字形相似，存在渊源关系。而作为古代回鹘人后裔的维吾尔等民族因宗教信仰的改变逐渐转用了横写习惯的阿拉伯字母记录语言，即今天在清代下马碑上所见的“回”文。

清代下马碑的价值与保护意义

下马碑虽不属于经典雕刻艺术、碑文内容也相对简单，但因其多为敕造或官造，选料与工艺水平皆高于凡常，多用于帝王宫殿、陵寝、坛庙等重要古建筑群，体现着一代定制与王朝威严，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承载者。时至今日，下马碑虽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但其所散发的浓厚时代色彩、保存的独特文化记忆，仍能引起我们的反思与回望。特别是清代多文合璧下马碑则更像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面镜子，民族特色十分鲜明。在后金与清初期，多用红椿、木牌或石狮子与作为“下马”提示标记。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国力的增强，不仅开始使用下马碑，还专为清太祖的福陵修建了两座十分精美、别具一格的下马石牌坊。但在这一时期内下马碑的文字形式还局限在满、蒙文合璧或满、蒙、汉文合璧。随着清朝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乾隆中期最终解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及西域回部问题之后，不仅在下马碑上增刻藏文、托忒文与察合台文，在接待西藏活佛、蒙古王公觐见的热河（今承德）地区还出现了更为少见的满、汉、蒙、藏文合璧铭文的纪事下马碑。而这类碑刻的出现不仅使多民族国家“同文之盛”得以具体彰显，又在同时赋予了这一传统谕令形式昭示“华夷一

统”文化标志的功用，表达了清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继承、发扬的一种基本态度与价值取向，体现着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征与前进步伐，折射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壮大并共同推动国家前进的规律与轨迹。而清朝统治者在紫禁城（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大



修复后重立于历代帝王庙门前的下马碑

高玄殿（祈雨雪晴阳）、文庙（祭孔）、历代帝王庙（祭华夏先王）等国家重要场所设立多种民族文字合璧的下马碑，并不仅仅是沿袭中国历代王朝的礼制成法而做出的一种简单的政治表态，更为主要的目的在于告诫并感化以汉、满、蒙、藏、回为主体的域内各族民众，不仅要正视、尊重统一国家中央政权，还要敬畏、尊崇华夏历代贤哲、帝王等重要的国家祭祀主体，这些对于当时各民族增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文化交融、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我国各地虽然保存着为数不少的下马碑，但是由于历史、分布等原因总量也已大为减少，保存至今者也多见不同程度的伤损或风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不可移动文物要由各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做出标志说明，建立

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也明确规定：区、县文物行政部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包括“修缮、安全、利用、环境整治等内容。”北京地区现存下马碑作为附属文物由产权或使用单位负责管理，整体保存状况较好。但对于全国其它地区同类文物的保护工作，也应引起所在地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及时做好文物的统一收集、专人管理、制作档案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严防破坏文物的事情发生。对于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下马碑，应制作碑拓文献保存，还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增建小碑亭或遮雨檐顶、钢化玻璃碑罩或加装防护栏等具体措施加强碑体保护，碑刻表面可适当添加无机或有机高分子材料保护层，防止空气中各类有害元素对碑体的侵蚀与风化损害。

西城的里弄式住宅探寻（下）

□ 白皓

（接上期）

其他几处“里”字居住区

阜成门内路南有一条民康胡同，位于金融街的最北边。民康胡同的北侧有小巷，小巷两侧目前各有四个院子，院门两两相对。院内都是五开间、背靠背、勾连搭式的双排房，由中间的内墙分隔成南、北两所单独的房屋。每个院子中间又有一道墙，将前面的北房和后面的南房隔开，使各自的房屋外都有一个狭长的院落。这是一处在30年代建造的里弄式小社区。住在13号院内的谢女士，今年87岁，身体健康，她现独居一个五开间的北房，后代不在身边。他跟我讲，她公公解放初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房子是她丈夫家为他们两口子结婚，于1955年用1200元买的，有产权。这地方以前叫崇善里，是由一个在西直门外开粪场的老板出资建造的。巷子最北端原是一所较大的宅院，一直延伸到阜内大街旁，是房主的家，现已不存，成为丰盛医院的停车场。巷子两侧的房屋用于出租，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从东北来京的人租住在这里。日伪时期，又有日本人住在这里。崇善里把口以前有一座随墙牌楼门，门额上方有砖刻“崇善里”的匾额，文革中严重损毁。崇善里的西边，同一条胡同北侧曾有保祥一里、保祥二里，都在1965年与崇善里一道并入民康胡同。保祥一里、二里在建造金融街时被拆除。



民康胡同崇善里俯瞰



民康胡同崇善里谢大妈家

民康胡同南边原有一个巷子，叫巨德里，同在现金街地区，是原双栅栏胡同路南的一条死巷。巷内只有一所大宅院，是20年代建造的，房主是东北军军官李文中，他给其宅院取名为“聚德李”，这条巷子后来一直被称为“聚德里”。解放后，聚德里与双栅栏胡同合并，整个巷子改称为巨德里。



安平里

巨德里于2002年后建设金融街时被拆除。

安平里是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西侧的一条东西向的死胡同，中间有段向南的折弯。它南侧紧邻琉璃厂西街，北侧是原京师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旧址。民国初，这里还是一片狭长荒芜的空场。大约在20年代初，这里建起两栋仿日式的楼房，南边一栋是由南、北两座二层连体式楼房，中间由悬廊相连，东侧临街一面墙体上开了一个门洞。两楼的结构不对称，南楼的正面有凹进去的墙体；北楼一侧的上下两层都有一条外廊道，每间房屋的廊道外侧都是圆拱形墙面，二层的廊道有铁栅栏护栏，可当阳台使用。北面那栋楼体量很小，面阔三间，楼旁有木楼梯通往二层。这两栋楼由灰砖砌就，墙面采用民国时流行的“带刀灰”勾缝，楼顶是斜坡式大屋

顶。当时这两栋楼的住户主要是北师大的教师。据老住户讲，抗战前曾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住过北侧小楼；著名学者夏仁虎先生曾任北师大教授，他也是《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女士的公公，他在这里住过相当长的时间；许广平女士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来北师大进修，她当时租

住过前面北楼一层的房间，这里也留下了鲁迅先生的足迹。在1916年版的京城详图上，还没有安平里的地名。自从这两栋楼房建成后，这里开辟出了一条小巷，以后又不断有人在这里建造平房院落，人气渐旺。巷子街口路南原有一座土地祠，光绪年间曾有民间集资赈灾组织“安平公所”（前身为安平水会）设在庙里，小巷由此得名叫安平里。目前安平里的住户有北师大教工及眷属和教育部职工。

安平里南边不远有一条巷子叫慎业里，它位于梁家园北胡同南侧，是20年代在原清代梁家园废墟的一块空地上兴建的。它东起梁家园胡同，尽头处向北折弯到梁家园北胡同，全长90余米，宽2米。巷子两侧各有八个小院，都有随墙门，两两相对，门坎有石条踏步。每个院子都是做工考究的小三合院，占地不到80平米，院子正房的外立面门窗别致，有西式味道。院子的东、西配房都和相邻院子



慎业里小院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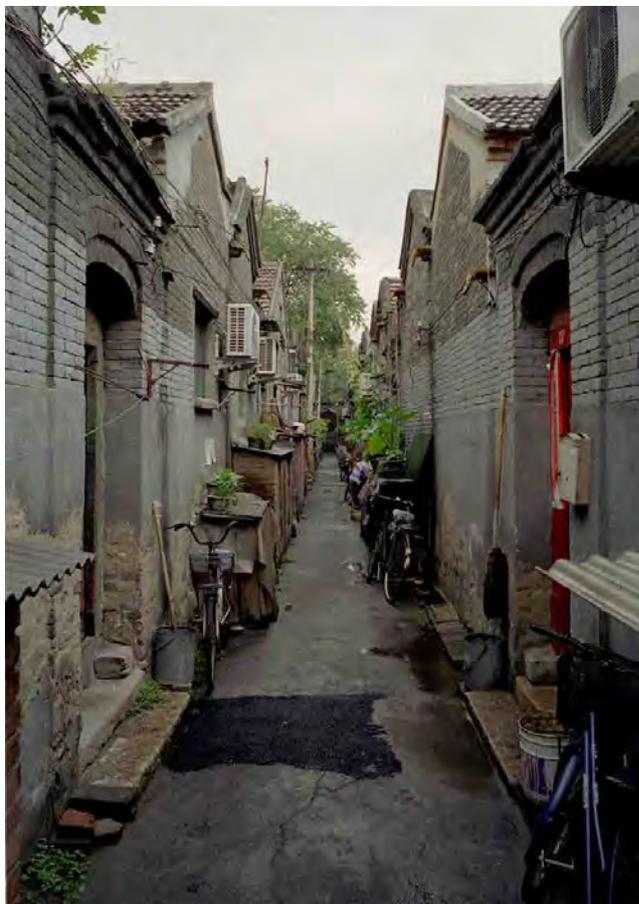
的配房背靠背，呈勾连搭样式，从巷子里看有波浪般的轮廓，别有一番江南里弄的感觉。我向这里的住户询问慎业里的来历，一位年近八十的女士告诉我，真正知道事的人几年前都不在了，她也只知道个大概。她说慎业里建成到现在快一百年了，当时是由一个天津商人出资建的，因离八大胡同很近，最初想作妓院，可一直没能办成，后来就交给他女儿和女婿代管出租房产。在抗战前，这里的全部房产就分别出售了。解放前，有几位唱戏的租住在这里，其中有郝寿臣的儿子，他在50年代因出身问题迁走了。慎业里的整体格局目前保留的较完整，还有一些住户，但大部分屋顶都变成了普通的洋瓦，大为失色。以前临街的牌楼门和两侧的通体墙壮观醒目，有石刻砖雕，可惜都已损毁。

提起儒福里，很多人会想到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过街楼，就建在原儒福里社区北端，横跨观音寺的东、西两院，形状古朴浑厚。这里地处陶然亭北、南横街南侧，在清代是临时营地，地势低洼，有观音寺和三关庙，住户不多。民国以后，这一

带不断有人建房聚居，形成居民区。20年代，通县电话局长王席儒出资在此兴建了“儒福里”小社区。它是一条东、西走向60米长的小巷，两侧各有5个院子。王席儒曾以此为据点，掩护过董必武等同志从事革命工作，董必武曾赠书“儒福里”，并镌刻在巷子西端的拱形门

洞上。西门洞内侧原有“碧云西拱”四字砖刻；东门洞上原有“紫气东来”砖刻。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此地及旁边的巷子一道定名为儒福里。在上世纪末，儒福里和其北端的那座过街楼在90年代末拓宽菜市口以南的道路时均被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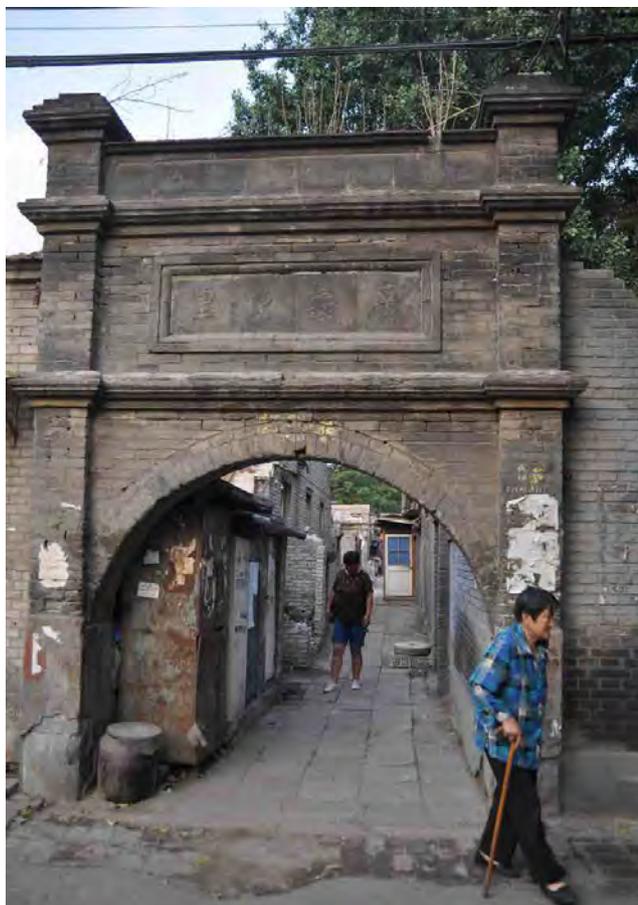
在宣武门外，民国时期兴建了广安东里、广安西里、权盛里和宏业里等。广安东里和西里建成年代较早，在20年代末的京城详图上就有标注。它们都地处校场口的南侧，解放前这一带是杂货和果蔬和农副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过往商户、店员和采办人员很多，不少人就长期租住在这里。原广安东里和西里紧挨，很可能是一个东家。西里建在两条南北向的胡同之间，巷子长20几米，两边各有几个小院落；东里在西里东口对面，挨着西里，是一条向东的死巷，巷子里建有排子房，临街有随墙拱形牌楼门。解放后，东里和西里之外的两条南北向胡同，东边的胡同与西里合并称为广安西里；东边的与东里合并称为广安东里。广安东里和西里随着城市改造近几年被拆除。



慎业里小巷内

权盛里建在校场小七条内，是一条死巷，长30米，宽10米，东西走向，巷子南北两侧原先各建有五个独立小院，两两相对，院子是青砖灰瓦的传统格局。权盛里建成时间较晚，之前在它周围就有校场口居民区。据传当时一位鲁姓商人在此置产，取名权盛里，一直沿用至今。解放后，这里的房产归国有，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宿舍。南边五个院子在80年代拆除，建成新宿舍楼；北边目前还有四个院子，都成了大杂院。

宏业里建在西草厂街南，铁门胡同和山西街之间，呈东西走向，建成时间较晚，也是在原有居民区内另建的里弄式住宅。宏业里巷子长90多米，宽3米多，一排院子建在巷子北侧，约七八套均为格局相同的三合院，随墙式院门设在中央。解放前，



广安东里牌楼门

这里住过不少外地来京唱京戏的，巷子东头就在京剧名家荀慧生宅院的后身，周围也住着不少京剧名家，相互交流、一道配戏也很便利。南方文人包天笑曾居住在这里，他在《铁门小住》里有过记述。随着这一地区的改造，宏业里目前仅剩东头一个院落。

民国时期，在京城兴建里弄式居住区较为流行，一直延续到解放前，除以上罗列的各处之外，还有虎坊桥南边的荫德里、蔚文里和吉祥里；复兴门内的嘉祥里；宣武门西侧民国众议院（现新华社社址）旁边的庆余里和松林里等地方。松林里紧临宣武门西侧城墙根，以前是菜园子，房东原是一位东北商人，大约在30年代初建成。东三省沦陷后，有不少来京的东北人曾租住在这里。解放前有部分

房产已出售，目前只有少数房产属于私人。松林里临街是抄手胡同，一面很大的通体墙上开了一个门洞，以前曾有木制门扇和门额，门洞内是向南延伸的小巷，东、西两边各有五个院子，东边的院子是三围房结构；西边的院子较大，是前后两排房夹着一个单间房。松林里在60年代末并入抄手胡同，门牌是36号—54号，目前大部分房屋均已翻修，只有48号院还保留着原貌。



松林里小院内景

民国时期，北京的房产交易频繁，传统的街巷胡同里又出现了很多小巷，形成新居住区。有不少小巷和里弄式住宅结构相似，但没起“里”字的名称，却挂着所在胡同或街巷的门牌，这要看房产主和当地警察局之间如何交涉了。比如：官园西侧大觉胡同路南的30号—44号，小巷东、西两侧各有八所排子房，房主的两个女儿各自分得了东、西两边的房产，当时号称“东八家”和“西八家”，住户说这里曾作过客棧；育德胡同西头路南的一个死巷两侧各有几所结构相同的院落，也是里弄式结构；菜市口东侧棉花下二条和骡马市大街之间有一条小巷，建成的较晚。巷子东、西两边各几个格局独特的小院，地址都是骡马市大街的门牌。目前在棉花下二条南侧、巷子北口的那座小牌楼门还在，巷子里只剩两所残院了。

建筑随时代而发展，里弄式居住区在京城兴起，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而出现的新景观，是社会

由封闭转向更加开放的体现。这种新式居住方式，格局紧凑，空间利用率高，使用灵活。京城里弄式住宅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样貌，又与传统街巷的风貌能和谐相融，不显得突兀。幽静的居住环境隔绝了都市的喧嚣，即保留了砖灰瓦的底色，又呈现出新的格调，使京城的邻里结构和人文风貌更加丰富多样，也增加了胡同的数量。

目前来看，不少里弄式住宅虽然保留下来，但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基本上成了大杂院的状态。虽然华康里和泰安里已得到保护和修缮，但有些保存较好的里弄仍面临拆除的危险，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考虑，若能保留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里弄住宅，将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幸事。本人在探访写作中，得到了刘苏、原启长、陈大平、祁正斌、侯磊、家住安平里的陈先生和家住松林里的郑大哥等朋友和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完）